

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 在新女性思潮中航向夢想的「中間層」*

顏杏如**

摘 要

本文嘗試從性別與社會階層的角度，追探一位擁有殖民地經驗的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經驗與軌跡，藉此檢視日俄戰後到 1920 年代，中間層日本女性移動的另一種路徑、動能、圖像，及其所具有的意義。

尾崎孝子，1897 年生於福島商家的舊中間層，家族事業在日俄戰後的經濟變動中沒落，開啟了一家的離散與移動。親族渡航殖民地成為日後孝子前往臺灣的先導。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市工業興起的背景下，孝子成為離村向都眾多青年中的微小身影。成為「職業婦女」的她，因商家的成長背景——未擁有文化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都市中淪為中下勞動階層，直到走入婚姻，始踏入新中間層的生活。從地方到都市，從工作跨入婚姻，呈顯了孝子渡臺前地理上的遷徙，以及社會階層的移動與複數經歷。

生活漸趨穩定的婚後，為了追求自我、實現文學的夢想，孝子不顧家人反對，航向臺灣。除了既存的親族網絡外，1910 年代少女時期透過閱讀經驗，接受新女性思潮給予的刺激，以及女子教育擴大後少女雜誌掀起的文學熱，皆是其航向殖民地背後存在的動能。

在殖民地臺灣，孝子專注於短歌創作，並成立以家計為考量的婦人社群，與官方的婦女團體無涉，經營屬於中間層婦人的生活圈。殖民地的生活、體驗與風土，成為自我充實的養分，也是短歌創作的礦脈。臺灣是其夢想實踐之地，他鄉變故鄉之地，也是職業寫作生涯展開之地。陸續渡臺的孝子之男性親族，皆在殖民地官廳的非正式僱用制度中覓得一職，提示了殖民地新中間層的形成樣態。

* 本文初稿曾以〈女性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為題，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評論人朱惠足教授、與會學者，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此項研究為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在帝國、殖民地與自我之間：中間層日本女性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2-245）之部分成果。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5 年 8 月 6 日；通過刊登：2016 年 1 月 15 日。

孝子的案例，與同屬中間層女性的殖民地經驗擁有一些共通性——透過在臺的親族網絡移動，與臺灣人社會的互動微乎其微，殖民地成為施展自我、社會階層上升的場域。但不同於在帝國擴張中輔佐男子向外開拓的類型，孝子的移動不僅逸脫了「賢妻良母」的框架，亦欠缺與國家的連結，提示了新女性思潮影響下，藉由移動、離鄉，追求自我實現的女性身姿。

關鍵詞：日治時代、移動、中間層、尾崎孝子、新女性、在臺日本人

- 一、前言
 - 二、從福島到東京：渡臺前的經歷與移動
 - 三、臺灣之行：移動、離鄉的意義
 - 四、殖民地臺灣的生活
 - 五、與臺灣之間的牽繫：從他鄉到故鄉
 - 六、結論
-

一、前言

隨著日本帝國的向外擴張，日本國內不同類型的人口也開始向外移動至帝國勢力所及之處。在這些航向外地的不同類型人口中，官營移民村的研究，從「殖民政策」的視角檢證移民村之設立，率先開啟了對在臺日人的關注，至今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¹ 然而，相對於這些仰賴國家計畫或企業資本的人群移動，不屬於政策移民、非集團移動的在臺日人，又與國家、時代背景、社會環境處於何種交互關係中？

與移民村研究約當同時出現，關注地域差異性的在臺沖繩人研究，則讓我們注意在臺日人內部的複雜樣態及多重位階。² 其後，對於內部存在著性別、出身地、階層等多樣差異的在臺日人，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相關討論。然而，綜觀目前的研究成果，在臺日人除了作為一個群體之外，以社會階層及性別觀其個體樣態，擁有較清楚輪廓與面貌者，大抵是作為社會上層的統治者，以及開拓先鋒

¹ 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8（1986年6月），頁74-84；張素珍，《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民為中心》（臺北：國史館，2001）；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7:2（2000年12月），頁51-93。

²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2007年10月），頁49-86。

的「男性」；對於在臺日本女性身影的勾勒，為數不多，且大抵集中在社會底層、迫於貧困而流入殖民地從事風俗業的賣春婦，³ 和依憑丈夫政治社會地位，透過結社活動與統治政策亦步亦趨的社會上層女性。⁴ 然而，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史料中，還可見到另一種類型的女性——既非社會底層、也不屬於上層，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在殖民地工作、生活的「中間層」女性。

「中間層」總稱在社會階層構造上，不屬於上、下任一層，構成中間部分諸多階層，隨著產業結構與社會組織的變化，又可區分為「舊中間層」與「新中間層」。前者指處於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擁有傳統的生產技能者，包括自耕農、中小工商自營業，以及專門職業者，如醫生、律師等自由業者；後者指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商品分配、勞動管理組織複雜化等企業組織條件的變化，而出現的大量雇用勞動者，以及隨國家、地方行政體系為基盤的統治機構擴大而日益增加，擔任統治末端的職業集團。相對於「舊中間層」，他們無生產所需之財產，且受僱於民間企業或官廳，以獲取薪資營生，其職業多為公司職員、公務員、學校教員、職業軍人等。日俄戰後到一次世界大戰的大正前半期，急速膨脹並確立其生活形態的日本新中間層，存在多種不同的稱呼，常見的有：俸給生活者、サラリーマン（受薪階級／salary man）、知識階級、中流階級、中等階級、新中間階級等。「俸給」（受薪／salary）標示其所得形態；「知識」標示其勞動型態，相對於肉體的生產性勞動，是為以知識為媒介的事務分配、管理；「中流」、「中間」、「中等」則標示其社會階層的位置——位於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生活水準居中。⁵

³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1）明治篇》（東京：田畑書店，1995），頁34-76；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頁49-72。

⁴ 隨著官吏妻子的渡臺，出現不少婦人團體，如篤志看護婦人會、臺北婦人懇話會、愛國婦人會等等。（參見竹中信子，《殖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1）明治篇》，頁60-80、130-166。）其中，上流階層女性所組成的愛國婦人會，往往配合時局提供統治上的協助，在不同階段，扮演著軍事援護、教化、中介滲透、戰爭協力等角色。參見洪郁如，〈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1904-1930年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灣風物》47:2（1997年6月），頁53-71。

⁵ 關於日本中間層的相關討論，參見大河內一男，《日本的中產階級》（東京：文芸春秋新社，1960）；岸本重陳，《「中流」の幻想》（東京：講談社，1978）；石川晃弘，《みせかけの中流階級：都市サラリーマンの幸福幻想》（東京：有斐閣，1982）；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編，《日本の新中間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寺出浩司，《生活文化論への招待》（東京：弘文堂，1994），頁184-186。

從殖民地的統計資料中，我們可以窺見不少中間層女性的身影，例如，官衙組織中的下級官吏、雇員，教育關係者的學校教師、博物館人員，商業交易中的賣主、店員，甚至自由業的作家、詩人等。⁶ 一些日本女性甚至留下著作，不過其移動軌跡與殖民地的生活樣態卻鮮少受到注意。⁷

為理解中間層女性在殖民地的足跡，及其在帝國擴張中扮演的角色，筆者曾以一位在臺八年的女教師高橋鏡子為例，追探其移動的背景、軌跡、國家意識與教育觀之間的關係。生於舊士族家的鏡子，受女子教育及輿論對女性角色期待的影響，其足跡與日本帝國勢力的擴張齊步俱進，不但以中堅分子之姿活躍於殖民地臺灣社會，更成為女性向滿洲移動的鼓吹者，主動參與了帝國的擴張。其事例顯示了中間層女性的面貌之一。⁸ 然而，如上所見，中間層女性本身帶著多樣雜沓的性質。除了擁有一定學歷、能力、文化資本，在殖民地擔任教師的女性之外，還存在如何不同類型的女性移動？帝國、殖民地與移動的女性之間，是否僅止於背負帝國使命、輔佐男性向外擴張的面向？筆者欲以一位女性歌人尾崎孝子為例，提示另一種移動的面貌與類型。

尾崎孝子，舊名山口かう，1897年生於日本福島，1918年與尾崎保正結婚，婚後第三年（1920）渡臺，直到1927年因保正患肺結核，偕夫返日，共居臺七年餘。在臺期間的1926年，出版第一本歌集《ねむの花（合歡之花）》，保正逝世後的1928年再度來臺，短暫停留數月，這段期間完成並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美はしき背景（美麗的背景）》。返日後，擔任《歌壇新報》、《新日光》等短歌雜誌記者，統籌雜誌事物，亦曾於戰後1950-1954年擔任逗子町會議員，並持續短歌

⁶ 參見〈職業（小分類）別人口〉，收於臺灣總督府編，《國勢調查結果表（全島編）》（臺北：該府，1934），頁120-127；〈有業者ノ職業（小分類）及職業上ノ地位ヲ種族及體性ニ分チタル職業數〉，收於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編，《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查集計原表（全島之部）》（臺北：該部，1923），頁684-767。關於殖民地臺灣社會中日本中間層女性的整體樣態，由於題旨與篇幅，期待作為日後的課題另文處理。

⁷ 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有一些關於在臺日本女性作家作品的相關討論，例如李文茹，〈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愛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吳佩珍，《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不過，這些研究旨在追探個人的境遇與作品呈現之間的關係，著重書寫臺灣所隱含的視線與意義。如何將「移動」、「跨境」、殖民地經驗等，放入社會結構中與時代脈動之間思考，仍是課題。

⁸ 顏杏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52（2013年12月），頁251-302。

創作，1970年逝於鎌倉。⁹

在臺灣史或臺灣文學領域中，尾崎孝子並不是一位普為人知的作家，亦無相關的研究討論。然而，日本統治時代的文藝評論家或親身經歷此一時期的文學家其實已注意到這位女性作家的存在。島田謹二在《華麗島文學志》中曾提及孝子，認為《美麗的背景》一書「記錄了內地人俸給生活者的生活紀錄」；¹⁰ 1950年代龍瑛宗也曾提及孝子，承襲島田的評論，認為《美麗的背景》以寫實的筆致描寫在臺日人的生活，並形容她的作品「沒有政治的色彩，換言之，沒有支配者的潛在意識」，但卻「如彗星出現如彗星消逝了」。¹¹ 戰後，亦有文學研究者注意到孝子的作品。河原功將《美麗的背景》一書，收入其所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文學集成 臺灣隨筆集一》中，並在卷末「作品解說」中簡介孝子的生平、參與的短歌結社、創作歷程、隨筆集所顯現的世界等。¹² 2007年，陳黎和上田哲二合譯出版《臺灣四季：日據時代臺灣短歌選》，除了「東臺灣之歌」外，皆出自孝子〈臺灣的自然與歌（臺灣の自然と歌）〉一文所挑選、評論的短歌。¹³

儘管為「內地人俸給生活者的生活」及臺灣的自然留下紀錄，並受到文學界注意，尾崎孝子個人的面貌、移動軌跡與殖民地經驗卻模糊不明。作為一位「中

⁹ 年代與生平簡歷整理自尾崎孝子的記述與相關文書。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為尾崎文庫整理的目錄中附有尾崎孝子的簡略年譜（參見〈尾崎孝子氏年譜〉，收於神奈川縣立文化資料館編，《文化資料館資料目錄：圖書の部 第1集「尾崎文庫目錄」①》〔神奈川：該館，1976〕），推斷該年譜應是整理自尾崎孝子自身的記述。不過，這份年譜記載孝子結婚（1919）與渡臺年代（1921）的年代恐怕與實際狀況有一年的誤差。從孝子自身的敘述：渡臺年（22歲結婚、婚後第三年的10月渡臺，保正較孝子晚四個月渡臺）、孝子在臺年數（7年左右）、離臺年（1927年6月）和尾崎保正出現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的年代（1921）交互比對可知，結婚應是1918年、渡臺應是1920年。年譜上出現的誤差推測源自於孝子對於自己年齡的敘述方式和今人的計算方式不同。

¹⁰ 島田對孝子的評價為：「筆力時而溫雅，但另一方面，女性特有的瑣碎主義令人感到煩瑣之處頗多，全體單調，有點冗長囉唆。處理好的素材，但僅止於日本「自然主義」風的「平面描寫」，有點可惜。」參見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1995），頁477。

¹¹ 龍瑛宗，〈日人文學在臺灣〉，《臺北文物》3:3（1954年12月），頁18-22。

¹² 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15：台湾隨筆集（一）》（東京：綠蔭書房，2003）。河原對於孝子渡臺年的記述亦延續神奈川圖書館尾崎文庫所編的目錄為1921年，此外，對於孝子丈夫尾崎保正在總督府工作的記錄不完整，誤以為只有1925-1926兩年在調查課。參見〈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解説〉，收於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15：台湾隨筆集（一）》，頁367-379。

¹³ 陳黎、上田哲二譯，《臺灣四季：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本書分為春歌、夏歌、秋歌、冬歌、雜歌、東臺灣之歌，除了東臺灣之歌外，春夏秋冬雜的分類亦承襲尾崎孝子選評時的分類。上田在後記中並簡介了日治時代臺灣的短歌結社。參見〈臺灣の自然と歌〉，收於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1928），頁269-314。

間層」¹⁴ 女性，孝子何以移動、何以創作，其背後顯現什麼樣的時代、社會與個人生命經驗之交互作用？島田謹二以「內地人俸給生活者」稱之，顯示孝子屬於前述「中間層」分類中的「新中間層」。然而，她在渡臺之前是否即屬「新中間層」，抑或該進一步地追問，她歷經了什麼樣的社會變動、走過了什麼樣的道途而成為「新中間層」？作為一位「新中間層」，又如何殖民地生活，展開什麼樣的活動場域，如何走向歌人之路？

孝子畢生留下不少著作，如：歌集《合歡之花》（1926）、《南天燭》（1929）、《女心秘抄》（1953）、《歷程》（1954）、《草木と共に（與草木同在）》（1964）、《花のいのち（花朵的生命）》（1968）、隨筆集《美麗的背景》（1928）、《萬華鏡》（1958）、《流水記》（1970）等。¹⁵ 除此之外，尚在報紙雜誌發表多篇短歌與短文；日本神奈川縣立圖書館亦藏有其歌稿、文件與書簡等。¹⁶ 本文嘗試透過孝子自身留下不同年代、形式的紀錄，追探其足跡、生命歷程與殖民地經驗。希望透過個案的實證研究，讓非屬於政策移民的個人移動經驗與航向殖民地背後的社會脈動立體化，同時，勾勒中間層女性多樣的移動軌跡與樣貌，藉此思考移動的日人女性與帝國日本、殖民地臺灣之間的多向關係。

二、從福島到東京：渡臺前的經歷與移動

關於孝子的早年生平，有許多空白之處，目前僅有其自身留下記述的《流水

¹⁴ 以尾崎孝子而論，新中間層與舊中間層之間的界線與流動，亦是本文欲處理的問題，因此行文沿尾崎孝子的生命經歷，分別使用廣義的「中間層」、分化後的「舊中間層」與「新中間層」等詞彙，在不同的文意與脈絡中。

¹⁵ 尾崎孝子，《ねむの花》（東京：ポトナム社，1926）；尾崎孝子，《南天燭》（東京：橄欖社，1929）；尾崎孝子，《女心秘抄》（神奈川：歌壇新報社，1953）；尾崎孝子，《歷程》（神奈川：歌壇新報社，1954）；尾崎孝子，《萬華鏡》（鎌倉：歌壇新報社，1957）；尾崎孝子，《草木と共に》（鎌倉：新日光社，1964）；尾崎孝子，《花のいのち》（鎌倉：新日光社，1968）；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尾崎孝子，《流水記》（鎌倉：新日光社，1970）。

¹⁶ 關於孝子的著作與相關資料分散各地，以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的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收藏最為完整，除了孝子自身的著作之外，尚有其生前的藏書（短歌相關三千多本，不少私家版）、歌稿，戰後的書簡、主編的雜誌《歌壇新報》（部分）等，但以戰後的資料為主。參見神奈川縣立文化資料館編，《文化資料館資料目錄：図書の部 第1集「尾崎文庫目錄」①》；神奈川縣立文化資料館編，《文化資料館資料目錄：図書の部 第2集「尾崎文庫目錄」②》（神奈川：該館，1980）。戰前的著作則是臺灣收藏較為完整，此外，亦有少數藏於日本的國會圖書館，或流通於日本的古本屋市場。

記》可推知其渡臺前經歷。該隨筆集寫於孝子晚年的73歲（逝世該年），敘述主角香子的家庭背景、東京生活以及臺灣經驗。¹⁷ 從複數的線索可推斷這是一本自傳性小說。首先，香子的日文發音、出生年月日都與孝子本人相同。¹⁸ 再者，關於臺灣經驗部分，《美麗的背景》、雜誌的投稿都可發現孝子與香子擁有相同的經歷。此外，其友人、亦是歌人的四賀光子在孝子逝世後的追悼特集中追憶道，歌集《花朵的生命》出版會時，她曾建議孝子撰寫散文式自傳，《流水記》即是在那之後出版。¹⁹ 綜合這些線索可知《流水記》是孝子晚年對生命經歷的回顧，以自傳性小說形式呈現，香子可說是她的化身，敘事時點始於主角香子出生前的家庭背景，終於歸返日本。返日後的經歷，則寫在〈行雲記〉中，然因體力狀況而未完成，孝子逝世後部分刊於《歌壇新報》，主角亦為香子，其內容與孝子返日後的經歷若合符節。²⁰ 考慮這份資料的性質時，上述線索以及作家向來的寫實風格，足以推斷內容應是孝子自身的真實經驗，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敘述中可能存在著記憶落差、美化或不存在的虛構。儘管如此，仍可從中推知孝子渡臺前的生活面貌、輪廓；即便存在虛構、添加之處，恐怕也都反映了她所認知的時代與世界，及其自身所欲強調的意識。

以下運用《流水記》，透過孝子描繪的自我化身——香子，追探孝子的出身背景為何，在渡航殖民地臺灣之前，有過何種經歷，這些經歷與渡航殖民地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

（一）生於商人之家：舊中間層的沒落與離散

《流水記》的主角香子，出身日本東北福島，母親キヨ來自商人家庭，外祖父カコ在福島市街外緣經營和服店三浦屋；父親則來自栃木縣農家，入贅至母親家，在香子六歲時離世。因此，香子除了小學有一段時間過繼給在栃木縣繼承父親家業的姑姑當養女之外，基本上是生活在母親的親族網絡與家庭環境之下。²¹

¹⁷ 尾崎孝子，《流水記》。

¹⁸ 從孝子戰後的競選相關資料，可以確認其出生年月日為1897年3月25日。參見〈鎌倉市市會議員候補關係資料〉（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

¹⁹ 四賀光子，〈かっこうあざみ〉，《歌壇新報》（1970年6月25日），頁3。

²⁰ 四賀光子，〈かっこうあざみ〉，《歌壇新報》（1970年6月25日），頁3；尾崎孝子，〈行雲記（二）～（五）〉，《歌壇新報》（1970年6月25日），頁12。

²¹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2-8。

孝子描述香子是在一個平凡的「中流家庭」中成長，雖屬於商人家庭，但家族成員帶文學系譜，多少熱愛書道、文學。外祖母カク在那個時代是少數能書寫的女性；外祖父能書、創作俳句；母親愛好小說，閱讀木板印刷的書籍；三個舅舅中，一人（純八郎）曾加入大日本歌道獎勵會，喜愛讀文藝俱樂部等雜誌，是彼時十一、二歲、熱衷閱讀少女雜誌的外甥女香子習短歌、俳句之啟蒙老師。²²

由於孝子後半的人生將大部分精力投注於歌壇，而《流水記》是其晚年生命歷程的回顧，因此不難發現在這部自傳性小說中她刻意強調主角香子家中的文學系譜、與文學的淵源及對文學的熱愛。其母親家族成員的實際經歷雖難以追查，但從經營地方上的和服店、家族成員的識字、書寫能力，可以推知孝子的出身背景，屬傳統自營業者的「舊中間層」——處於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擁有傳統生產技能者，即其筆下所謂的「中流家庭」。

然而，隨著日俄戰爭結束，在不景氣的時代中，外祖父去世，三浦屋也逐漸沒落。²³ 日俄戰爭時因日本政府增稅和舉債，產業界陷入不景氣，帶有奢侈意味的紡織業更受到強烈打擊；²⁴ 這也是香子生家和服店三浦屋沒落的背景原因。

三浦屋沒落後，外祖母經營古著店，母親與繼父共同出資開始生絲生意；舅舅之一善助則懷疑三浦屋的沒落，不僅是因為父親（香子外祖父）的驟逝與戰後不景氣，對姐姐キヨ處理財產的方式也感到不信任。一日舅舅拿走了母親店裡的300圓，和妻子、三個小孩從橫濱搭乘貨物船渡航到臺灣，在役所裡擔任下級官吏。²⁵

被舅舅留下的外祖母收起經營不善的古著買賣，投靠香子母親，1913年左右則被舅舅找去身邊幫忙家務，亦前往臺灣。²⁶ 另一方面，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生絲輸出停滯，町中許多生絲商倒閉，母親所經營的生絲生意也受到影響，經濟拮据之下，母親與妹妹搬到裏長屋，預計等在仙台服役的長男退役後，舉家遷往東京。在此之前，香子先到東京探路，尋找可能的工作機會。²⁷

²²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3-5、19。

²³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3-5。

²⁴ 大濱徹也，《明治の墓標：「日清・日露」—埋れた庶民の記録》（東京：秀英出版，1970），頁207-217。

²⁵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5-8。

²⁶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17。

²⁷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24-27。

這些看似十分「個人」的經歷，若放在當時代的社會環境中考察，可以發現其實是捲入了時代浪潮，受日俄戰爭與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變動的波濤所推至。日本的離村向都、都市擴張，亦是發生在日俄戰爭的經濟變動之後，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都市工業興起，更推進了勞動人口從農村、山村向都市移動，許多青年單身離鄉，為謀求就業機會而流入大都市的下層。²⁸ 香子的移動可以說是這些眾多青年中的一個微小身影。

《流水記》的敘述顯示，孝子出身於中小工商自營業者的「舊中間層」，然而在經濟環境變動下，隨著生家的沒落，家族也開始離散，外流至殖民地或都市。離散、謀生過程中，職業、社會階層也出現分化。留在家鄉的母親、外祖母起先繼續以傳統技能營生，仍屬於中小工商自營業的「舊中間層」，然而在經營不善與外在環境波動中，陷入了經濟困境，被排除在中間層之外；另一方面，舅舅則成為殖民地官廳的受雇者，轉為受薪階級的「新中間層」。舅舅的外地移動，也串起了日後外祖母與孝子相繼移動到殖民地臺灣的契機之一。一家的離散與社會階層的變化，可說是被捲入日俄戰後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變動與離鄉向都的時代漩渦之中。

（二）在大都市中浮沉：職業婦女·勞動者·新中間層

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十年間，是日本產業革命時期，經濟逐漸走向資本主義體制，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化急速進展，人口集中都市，隨著產業飛躍發展，經濟、政治、行政各部門急速膨脹，對公司職員、行政官吏等的需求擴大。此時，與工廠勞動者階層同時並行，受薪階級增加，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俸給生活者」，亦即前述的「新中間層」形成，並確立其生活形態。「俸給生活者」的「俸給」，是相對於工廠勞動者的「勞動賃銀」，前者為月薪制，後者為日薪制。²⁹ 孝

²⁸ 森岡清美，〈都市下層と新中間層〉，《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2（1988年6月），頁60-64。

²⁹ 參見寺出浩司，〈生活文化論への招待〉，頁185；大河內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頁95-96。關於新中間層的人數，由於統計資料的不完備，以及職業分類項目判斷的方式歧異，難以掌握正確的人數。奧田曉子指出年收500-5000圓，學歷中等教育以上者約當屬於新中間層的範圍。明治末年，年收500-5000圓的階層，約占全國人口的2.3%，1917-1918年則為5-6%，至1923年則增至11.5%。另一方面，中等教育以上者，1911年為5.9%，1917年7.5%。大河內一男則依據國勢調查推估1920年受薪階級(salary man)為有業人口的5.7%，1930年則上升至8.1%。從這些推估的數據可以窺見新中間層在1910-1930年代之間，在日本社會中的人口比例。參見：大河內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

子前往東京，正值這兩個社會階層出現的時期，到都市謀職的她，是否就此順遂地成為擴張中的「新中間層」，過著穩定的「中流」生活？

在《流水記》中，因家道中落而先至東京探路、覓職的香子，從事過多種工作：婦女雜誌的推銷員，挨家挨戶推銷雜誌；洋食店的女服務生；「肉店」太田屋的店員，往往工作至深夜；經濟新聞記者的兼職助手，每日到圖書館收集舊報紙的經濟版，提供股票研究之相關資料。母親、妹妹、兄長到東京與香子會合後，母子四人在四谷霞ヶ丘町租屋。兄長庄平一面求職，一面與母親從事家庭代工，後因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便籌措資金養雞，從而舉家遷至都市外緣的大井町車站附近，在田野空地間蓋起簡易住宅和雞舍。兄長以腳踏車運送新鮮雞蛋，妹妹到東芝電球（マツダランプ）的大井工廠工作，香子亦辭去兼職助手的工作，一同前往。³⁰ 在大井町外緣林地的簡易住宅與養雞生活持續了約兩年，後因前途晦暗，連同住宅與雞舍皆轉讓他人，還清借款，舉家再次遷居至品川。香子與妹妹仍每日通勤，在大井町的東芝電球工作，兄長日日尋找新的工作可能，未能如願的情況下離家消失。³¹

這段經歷顯示，在經濟變動下沒落的「舊中間層」家庭之處境及女性前往都市發展的樣態。隨著資本主義的發達，明治晚期到大正時期（1910-1920 年代中葉）是女性職業種類、人數逐漸擴大的階段。³² 其中，教師、事務員、打字員、護士、店員等，在當時被稱為「職業婦人」，屬於智識勞動、從業者多為女學校程度的中等學歷以上者；相對於此，在當時的用語中女工和「職業婦人」有所區別，被稱為「勞動婦人」，以身體勞動為特徵，從業者多為尋常小學校程度的初等學歷者。³³ 孝子前往東京的時期，推測約為 1915 年左右，時為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正初期，正是女性活躍進入社會的時期。「高等小學校」畢業的孝子，學歷介於女學校和尋常小學校之間，從事的職業包含店員、事務員、工廠女工等，

頁 120-121；奧田曉子，〈女中の歴史〉，收於奧田曉子編，《女と男の時空》（東京：藤原書店，1995），頁 396-397。

³⁰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28-35。此處的「肉店」指以肉類為主的飲食店。

³¹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40-41。

³² 村上信彦，《大正期の職業婦人》（東京：ドメス出版，1983），頁 18-21。

³³ 不過，當時對於「職業婦人」的用法、定義並不穩定，有時作為「摩登女性」的同義語使用，有時也包含了所有在都會工作的女性總稱。奧田曉子，〈女中の歴史〉，頁 349；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頁 162。

皆是當時常見的職種，就性質而言則橫跨智識勞動的「職業婦人」和身體勞動的「勞動婦人」兩類。

儘管孝子並未明記這些工作的收入，但透過一些片斷的記述，以及同時代的相關資料，我們可以推知其在東京的所得狀況。《流水記》中提到，洋食店的工作提供住宿與餐食，但沒有薪水，客人的小費即是收入。此外，她以感謝的口吻寫道，香子在太田屋工作時巧遇友人，並接受其好意擔任新聞記者的兼職助手，這份工作可獲得「女性一人自己養活自己剛剛好程度的薪水」。³⁴

1913年《婦人之友》對「新出現的婦人職業」之介紹顯示，事務員月薪為12-15圓，小學教員15-18圓，打字員15-25圓，速記員20-30圓；1918年《主婦之友》刊載〈婦人職業案內〉一文，介紹了二十七種女性職業，其中包含工廠女工，以印刷局、專賣局為例，日薪約為24-30錢。根據當時統計調查，事務性的職業收入通常為月薪，工廠勞動的薪資單位則為日薪，女性的薪資原則上被視為補助家計，因此薪資水準較男性為低。³⁵戰後初期經濟學者大河內一男形容大正時代的女性職員，儘管在職務型態上並非屬於生產性的勞動提供者，確實為提供特定的專門服務者，但以薪資所得而言，往往擁有「受薪階級」的外在樣貌，卻非「中產的」所得階層。³⁶

這些資料顯示智識勞動的「職業婦人」，所得高於體力勞動的「勞動婦人」，然而，前者的薪資水準卻又低於男性，也因職種而有所差異。對照《流水記》所述在東京歷經的種種工作，包含領取日薪的工廠勞動者、在「月薪族」中收入較不優渥的事務員、以及擁有受薪階級外貌卻無「中間」所得的服務提供者，如店員。香子時而為「職業婦人」，時而為「勞動婦人」，但即便屬於前者之時，也很難說是生活水準居中的「新中間層」。

根據《流水記》的敘述，生於商人家庭的香子，十五歲高等小學校畢業後，原本想就讀師範學校女子部，將來成為教師，最終因家庭因素未入女學校。其當初未積極升學有一重要原因：「比起成為學校老師領十五圓左右的薪水，若熱心

³⁴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29-32。

³⁵ 這裡列出的是最接近孝子前往東京的年代之薪資所得狀況，隨著物價波動，薪資所得狀況亦有變化，1919年社會政策學會編《婦人勞動問題》的調查統計亦顯示，儘管工廠勞動依業種別而有差距，但大致約為25-30錢左右。這些數據資料皆轉引自村上信彥《大正期の職業婦人》，頁22-41、74-78。

³⁶ 大河內一男，《日本的中產階級》，頁123。

經營家中生意，可以賺取數百圓，何苦成為卑躬屈膝的教師」。³⁷ 相對於不再擁有社會特權、必須重新具備養活自己能力的舊士族家庭出身者，商家擁有傳統的生產工具或資本，只需要買賣上的讀寫與算數能力，因而未如舊士族家庭重視教育、積極升學，甚至抱持著「反學歷主義」的教育觀。³⁸ 這也使得欠缺學歷資格的香子，當家中經濟捲入時代變動的波濤，進入都市謀生時，未能從事女教師、打字員、速記員等收入較優渥、新中間層常見的職業。以工作性質而言，也非穩定的受薪階級，有時是兼職、有時是工廠勞動，生活水準亦稱不上居中。換言之，到都市謀生的香子，並未順遂地轉入新中間層，未擁有學歷等文化資本的不利條件，使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大都市成為中下勞動階層。

移居品川後的香子，在一次偶然的機遇中與舊識——曾經的筆友龍吉相逢，交往半年後結婚，此時約當 1918 年春，香子二十二歲、龍吉二十七歲。龍吉自京都平安中學畢業後，入早稻田大學英文科，後因家庭因素輟學；相遇的此時，在銀座一間從事醫療器械貿易的外商公司工作，月薪 45 圓，婚後加薪為 50 圓。³⁹ 龍吉的工作性質為與貿易相關的翻譯，屬於頭腦勞動、領取月薪的「俸給生活者」。婚後一家搬離品川，母親、妹妹和龍吉同住銀座，香子則辭去東芝電球大井町工廠的工作，在上野的高級飯店打工、住宿，半年後香子則與龍吉、母親再次搬至上司位於原宿的閒置住宅。生活穩定後，香子開始參加早稻田大學的夏季文藝講座，到圖書館閱讀。⁴⁰ 孝子在隨筆集《美麗的背景》中形容兩人婚後的經濟狀況漸入佳境，隨著加薪與升遷，總算過著「普通的生活」。⁴¹ 在社會階層移動劇烈的近代化社會，對女性而言，婚姻是階層歸屬得以重新選擇的一次機會。⁴² 走入婚姻，也是香子前往東京後，社會階層的另一次變動——從中下勞動階層，

³⁷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16-17。

³⁸ 明治時期，接受中、高等教育者，以舊士族比例為高。這是由於士族和農民、町人（都市中的工商業者）不同，未擁有家業作為生產手段，因此熱衷於專門教養與知識，以擁有文化資本，並透過學校教育，達成社會階層的上升。參見天野郁夫，《學歷の社会史：教育と日本の近代》（東京：新潮社，1992）。

³⁹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43-46；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5-7。丈夫保正在《流水記》中化名為龍吉，在《美麗的背景》中，則名為省吾、和夫。

⁴⁰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45-46；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5；尾崎孝子，〈回想の春〉，《あらたま》5: 4（1926 年 4 月 1 日），頁 7-8。

⁴¹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7。

⁴² 上野千鶴子，《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 87。

正式跨入「新中間層」。

明治後期（1885-1911 年左右）的日本，「新中間層」以俸給支撐家計，收入較優渥者大約 50 圓至百圓之間。⁴³ 1917-1919 年，隨著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景氣榮景，物價攀升、米價暴漲，都市的新中間層生活日益困難，特別是月收 50 圓以下的白領階級。1919 年的《主婦之友》刊登了一篇中學校教師妻子的投稿，描寫月收 40 圓、八人家庭生活的苦境。⁴⁴ 從這些社會脈動可以推知，月收 50 圓的尾崎夫婦大約位處「新中間層」的中層，膝下無子的他們，在物價上漲的 1918 年也不至於過著拮据的生活。以經濟上的生活水準觀之，婚後的尾崎夫婦可以說過著不折不扣的「新中間層」家庭生活。

從地方移動到都市，從工作跨入婚姻，我們可以見到主角香子在空間地域與生命階段都經歷了移動、轉換，過程中，也經歷了舊中間層、中下勞動階層、新中間層三種不同社會階層的移動，呈顯了孝子渡臺前在都市中下層到中層掙扎沉浮的複數經歷。

三、臺灣之行：移動、離鄉的意義

婚後第三年（1920），孝子與鄉里的女性友人兩人結伴前往臺灣，計畫旅居半年，孝子寄居舅舅家，丈夫則暫留東京。⁴⁵ 日本女性前往臺灣，多是因男性前往殖民地赴任而隨行的「依親隨眷」類型之移動；在統計資料中，日人女性也以從屬者或無業者占多數。⁴⁶ 隨男性親族前往臺灣，若非因丈夫任官，也往往是緣於在日本本土發展不順遂，故前往殖民地臺灣尋找新天地。⁴⁷ 然而，孝子的移動雖然也「依親」——寄居舅舅家，但卻非「隨眷」，而是遠離丈夫、脫離家庭的

⁴³ 森岡清美，〈都市下層と新中間層〉，頁 60-64。

⁴⁴ 小山靜子，〈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東京：勁草書房，1999），頁 67-70。

⁴⁵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6-19；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3。

⁴⁶ 洪郁如，〈性別視角下的日本帝國域內移動與跨境：以臺灣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2014 年 10 月 3 日），頁 4。

⁴⁷ 以同為中間層的高橋鏡子夫婦為例，前往臺灣即是因從蒙古回到日本後未能找到工作，透過兄長的介紹到臺灣謀得一職。參見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頁 268-269。

單飛獨行，是以自身為主體的移動。抵臺後的孝子覓得一職，之後從事短歌創作，並非全然依附於男性親族的「無業者」或「從屬者」（不過在統計資料中，其是否被算在「有業者」則無法得知）。並且，孝子與丈夫並非在日本本土發展不順遂，相反地，其渡臺的時間點，無論在居住上或生活上，都屬於逐漸穩定的時期。

為何婚後經濟生活漸入佳境的孝子要離家前往臺灣？在她身上，我們又將看到何種類型的移動？

（一）對自我、文學的追求與實踐

關於孝子渡臺後的經歷，除了前述《流水記》之外，尚有《美麗的背景》及報紙、雜誌上的投稿文章、相關報導、記載等。其中，《美麗的背景》出版於1928年，寫作時間始於離臺後的1927年秋，完成於短暫渡臺的隔年4月。⁴⁸全書由八篇文章所構成，有時以第一人稱，有時以第三人稱（靖子、治子、她）書寫，但與其他資料比對，可知孝子其實是以自身經歷當作撰寫的題材，其中一篇〈活下去（生きていく）〉明白描述自己撰寫小說的心境與目的：以七年多的臺灣生活為背景，藉由創作形式，盡可能忠實地描寫自己的臺灣生活，以此探究人生。⁴⁹由於複數的資料能夠交互比對，足以確認孝子的活動與軌跡，因此，以下為了避免主詞的混亂，僅以孝子行文，不再區分她在不同資料中的複數化名。

在《流水記》中，孝子僅以「不甘於現在的小幸福，期待不同的開展與活躍」解釋前往臺灣的原因。⁵⁰不過，在剛結束臺灣時代所撰寫的《美麗的背景》中，她則更詳細地描述渡臺前猶豫苦惱的心境。

當時是尾崎夫婦結婚第三年，除了沒有兒女以外，生活基礎穩定，一切如理想般地平安無事，值此之時，孝子意外地生了一場大病。她對病中心境的轉折及其後決定前往殖民地的原因陳述如下：

此際生病，讓我思考許多事。人是肉身何時會遭遇什麼樣的事難以預料。

⁴⁸ 占全書近半篇幅的第一篇〈美はしき背景〉寫於1927年秋天，其餘則是1928年春天短暫停留三個月時於草山完成。參見〈卷末に〉，收於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344-345。

⁴⁹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222-227。

⁵⁰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49-50。

然而，我卻若無其事地過著沒有準備的生活，即便過去是不得已，但今後不能再這樣了。無論在經濟上，或是精神上。那麼我該做些什麼。我必須做些什麼。僅止是滿足於求溫飽，僅止於那些任誰都會的飲食、打掃，有空就看戲、到郊外遊玩等事，應該不是自己所有的能力。難能可貴的年輕時日僅是無意義地消磨下去的話，無論何時都翻不了身。這次要好好振作。等我病癒後定要好好用功。因此，如您所知我喜愛文學，也經常閱讀，但過去我從未曾想過，要花費自己漫長的將來，將文學當成是一份工作來努力。但從那之後，我一有空便到圖書館，開始研究了起來。我不斷地吸收我認為未來以作家而立所需要的東西。……（中略）終於，我嘗試書寫，結果，一日所讀雖不至百頁，然而，寫時卻無法隨心所欲。在一樣東西都無法完成下，變得想哭。

我最感到情何以堪的是，支撐創作骨幹的自身體驗是多麼的貧乏，自己的思想是多麼的淺薄，盡是因為喜歡所以創作，但卻沒有任何素養。已經不是有自信的時候了。……於是我抱頭努力思考。無論如何，若不從根本重頭來過不行，若不具備足以被評價、作為一個人的人格不行，若不更深入地觀察世道不行。想要成為藝術家者，若沒有相當的見識和實力，如何能有偉大的作品問世。首先必須要讓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更豐富。⁵¹

在這段引文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孝子婚後作為「新中間層」家庭的生活樣態——日常生活中衣食不虞匱乏，並有餘力從事「中流階層」的休閒活動；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孝子內心對自我與精神提升的追求，期待將長期以來對文學的喜愛與憧憬付諸實現。有趣的是，在渡臺動機的自我陳述中，儘管不斷地強調精神層次欲求，卻也隱約透露「翻身」的潛在渴望。事實上，病中的花費，使原本衣食無虞的家中經濟一時陷入拮据困窘，不但切身感受當時物價飛漲，甚至需要友人協助應急。⁵² 因此，「翻身」——提升經濟能力、翻轉社會地位的潛在欲望，是促使孝子重新審視生活，夢想以作家而立的契機。在付諸實行的過程中，磨鍊個人人格以及充實自我能力，成為當下的課題。為了讓「成為藝術家」的夢想實

⁵¹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8-11。

⁵²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8。

現，向殖民地移動，成為自我充實、豐富體驗的手段。

對於前往殖民地的想法，其實家人並不贊成。母親極力反對年輕夫婦分居；丈夫的姐姐諷刺地說臺灣流行著恐怖的疾病，有生蕃居住，一旦去了會變成白骨回來。丈夫多少也對這樣的期待與心願感到困擾，「不光是（丈夫）省吾，大部分的男性都希望妻子是自己方便的助手，玩耍的良伴，準備好吃的食物，在自己身邊好好處理家中事務」。⁵³ 家人的思考反映著傳統家父長制度下對女性的期待，同時也反映即便到了 1920 年代，日本內地仍流傳著脫離現實的臺灣認識。最後，在丈夫的理解體諒下，孝子於 1920 年 10 月前往臺灣，計畫短期旅居半年，停留至隔年 4 月。⁵⁴

若與 1920 年前往蒙古、1924 年渡航臺灣、同為中間層女性的高橋鏡子對照，孝子的渡臺動機顯然相當不同。鏡子的蒙古、臺灣之行除了存在著丈夫工作不順遂的明確經濟因素外，精神上則受到當時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方針的官方女子教育之影響——鼓勵女性在「輔佐男性」的定位上向外開拓；也與期待女性在帝國對外經營上扮演一定角色的輿論一致。⁵⁵ 與之相對，孝子的渡臺不但逸脫了「賢妻良母」的框架，無關「輔佐男性」，向外移動也非為了帝國的經營開拓，而是與國家、家庭無關的自我之追求。

（二）在新女性的思潮之中

一位大正時代的女性，何以可不顧家人反對、留下丈夫，與女性友人單獨前往臺灣旅居半年，只為了豐富自身的經驗，實現成為作家的夢想？若思考孝子個人的成長環境，及其與大時代的交錯——女子教育擴張所帶來的女學生文化，以及 1910 年代以來新女性的出現，便可以理解其行動雖然是一種逸脫，但也絕非異數，而是時代思潮下的產物。

生於商人之家，僅高等小學校畢業的孝子，未進入女學校，也因此不在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方針的女子教育影響範圍內，未透過學校接受「輔佐男性、向外開拓」的意識形態；但另一方面，孝子卻透過閱讀雜誌的經驗，與女學生文化，以

⁵³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1、15-16。

⁵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2-16。

⁵⁵ 顏杳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頁 261-263。

及文學在此一時期的發展產生交集。

在《流水記》中，香子十一、二歲（1907、1908 年左右），便熱衷閱讀女子文壇社的《少女》、實業之日本社的《少女之友》、博文館的《少女世界》，⁵⁶ 高等小學校畢業後的少女時代，閱讀的有：與謝野晶子《乱れ髪（亂髮）》、⁵⁷ 岡本かの子《かろきねたみ（輕妒）》、⁵⁸ 原阿佐緒《淚痕》，⁵⁹ 樋口一葉⁶⁰ 的小說、德富蘆花《寄生木》⁶¹ 等。此外，孝子回憶，「對那時的新女性、五色的酒、『原始的女性是太陽』的『青鞜』出現，抱持強烈的憧憬」。⁶²

1900 年代開始，隨著女學生人數增加，雜誌也開始分化，有別於少年雜誌，出現了以女子為對象的少女雜誌。《流水記》中所述的《少女世界》、《少女之友》即是明治時代流通較廣的代表性少女雜誌，分別創刊於 1906 年、1908 年，內容

⁵⁶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3-5、19。

⁵⁷ 與謝野晶子（1878-1942），生於大阪，舊姓鳳。1900 年加入東京新詩社，作品多數被刊物《明星》選用，為明星派的代表性歌人，富於大膽嶄新的創作手法驚艷於世，為明治 30 年代浪漫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1901 年，以鳳晶子之名出版其第一本歌集《亂髮》，歌詠女性的戀愛情感。該書出版後不久，與當時仍有妻小的與謝野鐵幹結婚，曾引發當時「家」意識強烈的日本社會保守人士撻伐。參見太田登，《日本近代短歌史の構築：晶子・啄木・八一・茂吉・佐美雄》（東京：八木書店，2006），頁 119-145。

⁵⁸ 岡本かの子（1889-1939），東京人，大正、昭和期的小說家、歌人。加入「新詩社」，和與謝野晶子同為浪漫派歌人。1910 年與畫家岡本一平結婚，婚後因個性上的衝突曾出現家庭危機，之後走向宗教研究、生命哲學之路。曾加入青鞜社，《かろきねたみ》為其第一本歌集，1912 年由青鞜社出版。參見岡本かの子著、宮内淳子編，《岡本かの子》（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

⁵⁹ 原阿佐緒（1888-1969），宮城縣人，歌人。受與謝野晶子的賞識加入新詩社，與原田琴子、岡本かの子被認為是該社三才女。生命歷經多樣的戀愛、婚姻問題。1913 年加入《アララギ（阿羅羅木）》，1921 年因與同門歌人、有家室的物理學者石原純相戀，遭逐出。《淚痕》為其歌集，1913 年由東雲堂出版。參見太田登，《日本近代短歌史の構築：晶子・啄木・八一・茂吉・佐美雄》，頁 371-379。

⁶⁰ 樋口一葉（1872-1896），生於東京，明治初期的女性作家、歌人。曾學習舊派和歌，留下四千首和歌習作。和歌的學習影響之後的小說創作。1889 年父親逝世後，為了支撐一家生計，立志成為職業作家，入東京《朝日新聞》專屬作家半井桃水門下，學習小說創作，1892 年發表《闇桜》。之後發現小說難以營生，改開雜貨屋，約當此時，與《文學界》同人交流，生活中的體驗與艱辛孕育了其名作《たけくらべ（比肩）》，此後以小說家展開新生涯，著有《にぎりえ（濁江）》、《十三夜》、《わかれ道（分道）》等。這些作品抗議家庭中男尊女卑的習慣、描繪該時代女性的悲哀。另外，1887 年到離世為止留下了數量龐大的日記，成為理解其身為明治時代女性作家的貴重紀錄。參見木村真佐幸，《樋口一葉と現代》（東京：翰林書房，2005）。

⁶¹ 德富蘆花（1868-1927），生於熊本，小說家。本名健次郎，曾入兄德富蘇峰の民友社擔任記者。1900 年以《ホトトギス（不如歸）》確立其在文壇的地位。以基督教人道主義立場為人所知，與蘇峰因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1907 年進入半農生活，致力於「生活即藝術」的文學。著有《自然と人生（自然與人生）》、《思出の記（回想記）》等。參見蘆花會編，《德富蘆花：検討と追想》（東京：岩波書店，1936）。

⁶²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8。

多為少女劇團、外國影星的相關新聞、少女小說以及讀者投稿作品等。其讀者通常為就讀女學校、中間以上階層的女子，且以都市居住者為主，但也有一些為女工、職業婦女，甚至是小學校高年級生。⁶³

孝子的小學校時代因過繼給姑姑，故在地方的小鎮（栃木縣安蘇郡赤見村出流原，今佐野市赤見町出流原）度過，之後回到祖父母、母親身邊（福島市）。⁶⁴ 15歲高等小學校畢業後，因家庭因素未入女學校。這些個人的成長經歷顯示孝子不是少女雜誌最典型的讀者，但仍在讀者群的光譜中，不排除《流水記》所記閱讀經驗的真實性。

相關研究顯示，少女雜誌扮演了將「少女」國民化的媒體機制、提示了少女特有的規範，如愛情、純潔、美等；但另一方面，也在逸脫國家框架與規範的場域中衍生了少女文化，掀起了女學生之間的文學熱。⁶⁵

另一方面，1910年代以「青鞜社」為中心，出現「新女性」，反抗家族制度和賢良妻良母主義，追求母親、妻子以外的生活方式，嘗試打破加諸女性的束縛、追求自我，企圖實踐性與愛的自由，也爭取婦女參政權、教育、職業上女性的權利和地位之提升。⁶⁶ 《流水記》中提及的與謝野晶子、岡本かの子、原阿佐緒都擁有勇於追求自由，違反傳統社會規範的戀愛情事。「五色的酒」⁶⁷ 在當時的媒體中以放蕩、負面的意味出現，然而在孝子的敘述中，卻是用於新女性自我解放的正面意義上。

與這些閱讀經驗互為參照，在戰後的隨筆集《萬華鏡》中，孝子追憶歌人前田夕暮時，提及自己十六、七歲的少女時代閱讀《女子文壇》，十八歲（1914年）

⁶³ 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東京：勁草書房，2007），頁12-17；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頁188-189。

⁶⁴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5-6。

⁶⁵ 稻垣恭子，《女学校と女学生：教養、たしなみ、モダン文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7），頁42-79；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東京：新泉社，2007），頁130-156。

⁶⁶ 堀場清子，《青鞜の時代：平塚らいてうと新しい女たち》（東京：岩波書店，1988）。

⁶⁷ 雞尾酒的一種，將色彩、比重不同的五種洋酒倒入杯中，產生漸層。始於法國，明治末到昭和時代流行於東京銀座。青鞜社的成員尾竹紅吉邀請某間酒吧在《青鞜》刊登廣告，尾竹屢次前往該酒吧飲用五色酒，被當時的報紙媒體批判「青鞜的新女性，女人卻喝著五色酒」。在保守人士眼中，用以比喻當時被視為墮落糜爛的摩登男女私生活之浪蕩。參見堀場清子，《青鞜の時代：平塚らいてうと新しい女たち》，頁111-112。

開始投稿《文章世界》、《女子文壇》。⁶⁸ 另一方面，在《流水記》中，描述第一次渡臺是十七歲，隨外祖母在臺兩年，期間曾投稿《文章世界》、《女子文壇》等，結交了一些筆友，有時通信，有時約會。與筆友交往在舅舅眼裡看來是荒謬、不能容忍之事。然而日後與丈夫相識的機緣也源自於此——回到日本至東京謀生後，某日在路上巧遇當年的筆友。⁶⁹

孝子是否在 1920 年以前已來過臺灣兩年，與丈夫保正初識的過程是否如其所述，在其他資料中沒有相關紀錄，難以判斷其真實性。不過，投稿《文章世界》、《女子文壇》，應是確有其事。除了前述《萬華鏡》可見到相關描述外，筆者確認了當時的《女子文壇》，確實存在著投書欄「誌友俱樂部」，常有讀者在此自我介紹，期待廣結筆友或交換書籍、雜誌等。⁷⁰ 今田的研究指出，當時投稿少女雜誌者常被視為「不良少女」，⁷¹ 孝子的描述也顯露了這樣的風氣。

從這些史料的比對以及孝子寫實的創作風格等線索，筆者傾向推論這些敘述存在著一定的真實性。可以說，孝子幼少時代閱讀的《少女》、《少女之友》、《少女世界》等少女雜誌，將之捲入了女學生之間的文學熱，使其進入少女時代後持續閱讀文學作品與文學雜誌，甚至嘗試投稿、結交筆友，在逸脫國家框架與規範的場域中參與了當時的少女文化。但也必須注意，這些敘述不無存著對自身經歷「美化」或「添加」的部分——不斷強調自身與短歌、文學、新女性的淵源，並將自己的經歷與文學之路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定義。

⁶⁸ 〈菜の花忌に偲う 前田夕暮〉，收於尾崎孝子，《萬華鏡》，頁 162-172。

⁶⁹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41-42、52。《流水記》的敘述中，主角香子第一次渡臺是 17 歲（1914 年春），當時祖母應在臺灣的長男之邀前往，香子要求同行，在臺灣停留兩年。不過其他的文件中不見相關紀錄，《美麗的背景》中也未曾提及。

⁷⁰ 〈誌友くらぶ〉，《女子文壇》11:4（1915 年 4 月）。根據筆者目前的調查，《女子文壇》有兩份雜誌，一是明治時代十分具代表性的女性投稿雜誌，1905 年 1 月由「女子文壇社」創辦、發行，1913 年 8 月廢刊，內有投稿欄、短篇小說、雜文、新體詩、短歌、俳句等。另一是「婦人文藝社」發行的《女子文壇》（1913.9-?）。從孝子敘述的年代，以及內容（前田夕暮等人的短歌等）可知其所指的應是婦人文藝社發行的《女子文壇》。不過目前筆者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所找到由婦人文藝社發行的《女子文壇》所藏不全（僅有 1913.12、1914.1、1915.4），未知其廢刊年代，亦未有相關研究，其系譜尚待確認。女子文壇社所發行的《女子文壇》則與「青鞵」、新女性之間具有關聯性。參見杉本邦子，《明治の文芸雜誌：その軌跡を辿る》（東京：明治書院，1999），頁 142；金子幸代、中村真也，〈〈新しい女〉とは何か：一九一三年における「女子文壇」の文化史的研究〉，《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48（2008 年 2 月），頁 164-140；金子幸代，〈「青鞵」と「女子文壇」：「新しい女」・発禁問題〉，《社会文学》35（2012 年 2 月），頁 74-84。

⁷¹ 今田絵里香，《「少女」の社会史》，頁 19。

綜觀這些考察，在大都市中廣受女學生歡迎的少女雜誌，影響了孝子的少女成長階段，以及其對文學的憧憬；也反映了新女性思潮在青少年成長階段刻劃的痕跡。成長於地方都市、未進入女學校的孝子，透過閱讀的經驗，與女學生文化接軌，同時受到新女性思潮的影響，連結了航向殖民地臺灣之路——追求自我、實現夢想。

（三）移動與女性友人們

在孝子的敘述與移動經驗中，我們還可看到圍繞在其身旁，其他追求自我、自由戀愛，掙脫束縛的「女性們」之移動身影。

在《流水記》中，香子有多次在日本國內移動的經驗，或成功、或失敗，過程中，皆有女性友人的同行或身影。這些女性，往往都因為愛情而堅決離家，或上京習得一技之長。例如，家中的女中（幫傭）ソデ因愛上鄰村同業的養子，想前往東京三越裁縫部學習，香子趁此機會欲同行，想要走喜愛的文學之路，儘管最後被家人發現攔阻。一次世界大戰後，家中生絲生意停滯，香子先到東京探路，尋找可能的工作機會時，亦有和服店的女兒友子要求同行，友子其實是為了與愛慕的人見面而決意上京。⁷² 留下丈夫在東京，自己前往臺灣，也是與鄉里的友人，婚姻不順的「道子」同行。⁷³

這些女性動身前往都市或殖民地，並非只基於單純的經濟因素，更非為家為國犧牲奉獻，有時還是為了追求愛情或自我。孝子從地方到都市的移動存在著經濟因素，然而，航向殖民地則是對自我、藝術的追求與憧憬；臺灣並非迫於生計、謀求更好工作而移動之地，而是豐富自身體驗、作為精神食糧，以為創作泉源之地；其女性友人的移動則是追求愛情，或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口。這些並非在「賢妻良母」、「女性輔佐男性」的官方輿論磁場中產生，而是與大正時期的自由風氣、新女性思潮的出現密切相關。此外，在孝子的許多敘述中，都無意識地顯示「移動」／「離鄉」，作為自我追求的一種手段或方式——無論是前往都市或殖民地。

⁷²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14-19、26-27。

⁷³ 參見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3；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6-19。《美麗的背景》中稱同行的友人為 A，並對其身世有詳細的描述：雙親雙亡，相依為命的兄長青年即逝，A 結婚四、五年，婚姻不順，離家到東京依靠唯一的叔母，之後因嫁到臺灣的姊姊邀約而前往臺灣。另外，《流水記》記述道子的姊姊嫁到臺北，可以確認與 A 為同一人外，亦寫下「道子後來在臺北結婚，對象是群馬出身的人，後來返歸鄉里成為未亡人，至今仍快樂地過著餘生」，應確有其人。

大部分的中下層女性鮮少為自己移動的動機與過程留下紀錄，孝子是其中少數，藉著她的紀錄，也讓我們得以窺見這一類型女性移動的身影。

四、殖民地臺灣的生活

渡航臺灣後的孝子，在何種機緣下從旅居轉為定居，其移動經驗又如何牽動親族的動向？築夢文學的孝子如何經營生活，殖民地經驗又對其生涯與職涯產生何種影響？在殖民地的特殊場域中，孝子的人際網絡為何，又處於何種社會階層，呈現何種生活樣態？以下筆者嘗試透過考察孝子在殖民地臺灣的生活樣態，描繪其殖民地經驗，同時一窺在臺日人新中間層的形成過程及其生活樣態。

（一）初抵臺與植物臘葉標本館

1920年代渡航殖民地的女性，並非扮演開拓先鋒，在陌生的「外地」，人際網絡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孝子的舅舅、外祖母已在臺灣擁有一定的生活基礎，是她選擇到臺灣「充實自我」的潛在因素。而同行的友人從東京移動到臺北，踏上人生新旅途，也是因為嫁到臺北的姐姐一家慫恿邀約。渡臺之初，孝子寄居臺北城南郊外的舅舅家中，並透過舅舅，很快地找到工作。⁷⁴ 換言之，儘管孝子的移動是基於自身對追求夢想的渴望，然而，已存在於親族間的臺灣經驗、人際網絡以及支援，皆是使移動成為可能的重要因素。

孝子工作的地點是搜集「南支南洋」等各地植物臘葉的臺北植物園臘葉室。⁷⁵ 臺北植物園前身為1896年成立的臺北苗圃，由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業試驗場管理，幾經擴張，1904年設置植物臘葉標本館，專事植物臘葉標本的收集，亦即孝子工作的地點。1921年中央研究所成立，接管林業試驗場，臺北苗圃亦更名為臺北植物園。1920年末在此工作的孝子描述：「臘葉館在三四年後，變成清素的洋館，內地少見的健全設備，臺灣唯一的臘葉館」。⁷⁶ 現存於植物園的「植物園臘

⁷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25-27。

⁷⁵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42-43。

⁷⁶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47。

葉館」建築落成於 1924 年，⁷⁷ 與孝子的敘述相符。

孝子的工作內容為協助整理植物臘葉標本，這些工作對她而言並不困難——在一個大工作桌上，將高山植物、熱帶植物、平地、海邊等各類植物的臘葉標本歸類整理，有些工作性質在她看來甚至很「適合女性」，例如製作押葉——在白色的臺紙上用白色有黏膠的細紙將植物葉子妥切地固定。⁷⁸

臘葉室裡只有主任 S 氏、一位吳姓臺灣少年，以及孝子三人。⁷⁹ 主任 S 氏專門採集臺灣特有的植物。⁸⁰ 推測孝子記述中的 S 氏，應是專門研究臺灣植物，並長期致力於臘葉館擴充與標本蒐集的佐佐木舜一。⁸¹ 孝子工作空檔偶爾會和主任聊天，但主任因植物採集經常不在。當時的植物園園長金平亮三，⁸² 偶爾也會到臘葉室，孝子在《流水記》中記錄著與金平幾次的互動。佐佐木舜一或金平亮三的著作，大抵記錄著植物採集與觀察、研究成果，很少看到他們在自己建構的標本館中工作的樣貌，而孝子的紀錄讓我們窺見了這些側面，以及植物標本製作背

⁷⁷ 「植物園蠟葉館」於 2008 年公告為市定古蹟，但館內標本與業務等，於 2000 年遷移至新址的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育大樓內。參見「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下載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網址：http://taif.tfri.gov.tw/taif_ch/；「植物園臘葉館」，下載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AO9711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2&siteId=101#01>。

⁷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43；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4-55。

⁷⁹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43；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4-55。

⁸⁰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47-48；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4。

⁸¹ 佐佐木舜一（1888-1961），大分縣人，在臺三十多年，專門研究臺灣植物，著有《臺灣植物名彙》（1928）、《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臘葉館目錄》（1930）。根據吳永華的調查，植物學者大井次三郎（東京國立科學博物館）在佐佐木逝世後為其所寫的訃文道：佐佐木「從大正七年（1918）任職於總督府技手勤務以來，便專注於中央研究所臘葉館的擴充與標本蒐集」（引自吳永華，《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1997】，頁 254-255）。不過，這段紀錄在年代上可能有些記憶的錯誤，根據總督府職員錄可知，1916 年佐佐木舜一開始任職於殖產局林業試驗場，但是以雇員的身分（1919 年轉為屬），1920 年才任技手，此外，中央研究所於 1921 年 8 月才成立。隨著該所成立，佐佐木在 1922 年的職員錄為中央研究所林業部技手，直至 1938 年。儘管如此，從大井的回憶仍可知佐佐木長期為臘葉館奉獻。另一方面，《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臘葉館目錄》的序文由佐佐木所撰，署名處為「臘葉館主任 技手 佐佐木舜一」。從這些紀錄都可推斷，孝子所說的主任應指佐佐木舜一。參見〈序〉，收於佐佐木舜一，《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臘葉館目錄》（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1930）。

⁸² 金平亮三（1882-1948），岡山縣人，1907 年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林學科畢業。1909 年渡臺，任林業試驗場長，1920 年獲東京帝國大學林學博士，1921 年擔任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在臺二十年，1928 年返日任教於九州帝國大學農學部。畢生致力於臺灣樹木、熱帶林學、南洋植物分布的研究，亦為殖民地臺灣林學的發展奠定基礎。著有《臺灣樹木誌》（1917）、《南洋群島植物誌》（1933）等書。參見吳明勇，〈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亮三與臺灣近代林業學術的發展〉，《臺灣學研究》13（2012 年 6 月），頁 65-91。

後助手們的身影。不過，她卻未提及與臺灣人吳姓少年的互動關係。

臘葉館的工作是領取「日薪」80錢，比較接近兼職工作性質；以薪資型態而言，並非「俸給生活者」的「月薪制」，而較接近工廠勞動者的「日薪制」。若翻閱1920年12月出版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公學校教師的法定薪資為月薪30圓以上70圓以下，而大部分的實質薪資多為40圓以上。⁸³由此可以推知孝子的收入狀況若以月所得計，也絕非「中產」，顯示初來乍到臺灣的她，並非領取月薪的「俸給生活者」，以薪資型態和所得水準而言，則更接近中下階層的勞動者。孝子其實擁有其他收入更好、更體面的工作機會，但卻選擇了這份工作。工作的目的，是希望不仰賴丈夫、獨自負擔旅行的生活費，以符合自身的理想——「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修養，親近風物，過有意義的半年」。⁸⁴可以推知選擇臘葉館的工作是為了有較自由的時間，也再次呼應前述，孝子的渡臺並非迫於窮困，也非為了擁有更高、更穩定的收入，充實自我才是渡航殖民地的主要目的。

除了可以獲得基本的生活支出外，更重要的是，在植物園工作及標本製作讓孝子認識了許多花草植物的名稱，並且，下午四點工作結束後可以自由地在圖書館閱讀，擁有較多可支配的時間。⁸⁵植物園臘葉館的這份工作，雖然只持續一年多（至1922年3月），⁸⁶但在人際網絡與「自我充實」這些點上，恐怕都是孝子展開臺灣生活與日後成為歌人隱約的資產。

（二）丈夫與親人的陸續渡臺：殖民地新中間層的形成

一次世界大戰後到昭和初期，隨著不景氣來襲，許多公司破產、裁員，受薪階級地位急速扭轉，陷入人口過剩與失業，「腰弁」、「洋服細民」等稱呼於此一

⁸³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0年12月）。查1920年該職員錄出版兩冊，一為8月，一為此處所舉的12月。比較兩職員錄可知，總督府在9月份進行全面性的調薪，以公學校教師為例，過去的法定薪資為月薪15圓以上40圓以下。參見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0年8月），頁18。由於孝子渡臺的時間點為1920年10月，故在此以調薪後12月份出版的職員錄為比較對象。

⁸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25-28。

⁸⁵ 關於金平亮三，在《美麗的背景》中，孝子只以「植物園的園長、高山林學博士」稱之，然在《流水記》中則明記姓名。關於與金平亮三的互動，孝子描寫金平吃驚她一位女子卻閱讀《中央公論》；曾問她是否要當打字員，她則回以想寫小說等細微的互動。此外，金平夫人和孝子同鄉，也同為基督徒，偶爾會招待尾崎夫婦至家中作客。參見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43、49-51；尾崎孝子，《流水記》，頁54-55。

⁸⁶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61。

時期開始出現，顯示對俸給生活者的輕蔑和憐憫。⁸⁷ 留在東京的丈夫保正，經濟狀況亦開始受到影響；孝子渡臺四個月後的 1921 年 2 月初，他也隨之渡臺。其背景在於保正任職的公司受到 1920 年戰後恐慌的影響，經濟狀況不佳，加以孝子的慫恿——臺灣自然環境明亮、氣候佳、生活容易，於是打算來臺一、兩年度過不景氣。透過金平亮三的介紹，保正到臺灣總督府海外調查部工作，內容主要為翻譯英文新聞、雜誌的重要記事。⁸⁸ 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可以確認尾崎保正 1921-1923 年，以及 1926 年任職於總督府調查課，1924-1925 年則任職於殖產局商工課；起初為雇員身分，1923 年起轉為囑托；第一年月薪 75 圓，之後逐年調整，至 1926 年時月薪 97 圓。⁸⁹ 對照此一時期日本本土的受薪階級，正面臨著生活困境與不安，⁹⁰ 移動至殖民地臺灣的尾崎家可以說是脫離了經濟不安的威脅，且能繼續維持新中間層的生活水準。

不過從殖民都市臺北的狀況檢視尾崎家在社會階層中所處的位置又如何？1920 年代沒有家計或中間層相關的社會調查，但我們能從 1930 年代的資料獲得一些推測的依據。1936 年一份中間層俸給生活者住宅狀態的調查資料指出，月收 50 圓以上～250 圓以下的俸給生活者占臺北市所有俸給生活者的八成以上；⁹¹ 隔年一份以月薪 40 圓以上～150 圓以下的受薪階級和勞動者為調查對象的家計調查報告則顯示，內地人受薪階級月收 60 圓以下的世帶為零，60-79 圓者占 7.29%，80-99 圓者占 20.53%，100-119 圓者占 20.53%，120-139 圓者占 15.89%，140 圓以上者占 35.76%。⁹² 這份調查屬於募集採樣而非普查，因此排除了許多不符

⁸⁷ 大河內一男，《日本的中產階級》，頁 25-28、98-100。

⁸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49、55；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56。

⁸⁹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保正 1921 年的月俸 75 圓遠遠高於前述 1918 年在東京工作時的月薪 50 圓。不過，1920 年以後無論日本、臺灣的薪資皆大幅上修，因此難以比較渡臺前後所得水準的差異，但脫離戰後恐慌的威脅與不安則是無疑的。

⁹⁰ 1922 年大阪市所進行的「俸給生活者調查」，對當時受薪階級的生活不安描述如下：「俸給生活者，近來顯著地受到生活難的威脅，儘管接受最高教育，仍無法從生活不安的境地中脫離，掙扎著想渡過浮世的波濤。」轉引自大河內一男，《日本的中產階級》，頁 99。

⁹¹ 臺北市社會課、臺北市社會事業助成會編，《臺北市に於ける中間層俸給生活者住宅調査》（臺北：該課、該會，1936），頁 1。

⁹² 臺灣總督府官房企劃部編，《家計調查報告：自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三年十月》（臺北：該部，1940），頁 1-3。這份調查以募集方式進行，並設有一些條件，例如有記家計簿者、月薪平均 40 圓以上 150 圓以下、以世帶主的勤勞所得為主要收入等。最後採用的世帶總數為 745，包含內地人世帶 355，本島人世帶 390。

條件者，但仍提供我們一些線索。雖然兩份資料在時間點上都和尾崎家的狀況有些落差，但可以推知他們在殖民都市臺北俸給生活者（特別是日本人社會）中的經濟狀況應屬中間，甚至是中下的位置。

孝子的渡臺，並非一般常見的妻子隨丈夫就職、轉調而赴殖民地，相反地，是由受自由風氣影響的妻子孝子先行，並透過自身的人際網絡為丈夫保正覓得一職，開展了殖民地生活之路。事實上，之後在東京生活不易的妹妹一家也在孝子的協助下於 1923 年渡臺，透過丈夫上司的介紹，妹夫到專賣局任職。根據孝子所述，妹夫一開始在專賣局的地方支局之間輾轉調任，之後擔任臺南支局長，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終戰後仍在臺灣留用一年。⁹³ 從這些線索對照《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以推知其妹夫應是高橋堅吉，1923 年起擔任臺北專賣局支局基隆出張所雇員，1926 年起任專賣局酒課書記，之後轉調宜蘭、埔里等地，直到 1943 年起擔任臺南支局長。⁹⁴ 戰後，孝子在歌稿中也曾描寫妹妹遣返日本、重逢話天明，以及終戰數年後遣返者一家恢復平靜的日常生活情景。⁹⁵

從尾崎一家及其親族的經歷可以看到，家族成員中一人的冒險精神，往往串起整個親族的移動。此外，除了孝子自身受新女性的時代風氣影響渡臺，圍繞其身邊的男性親人——或早於她的舅舅，或晚於她的丈夫保正、妹夫高橋堅吉，渡航至臺灣後，皆擔任下級官吏、雇員等職位。求職的過程皆透過親人、上司、同鄉等人際網絡安插職位，相似的情況，亦見於舊士族家出身的鏡子丈夫高橋壯吉之案例，⁹⁶ 可以窺見殖民地大量下層吏員形成的樣態之一。殖民地臺灣提供沒落的舊中間層、舊士族新的工作機會，經濟不景氣中更是尋找機會的出口，發展良好的狀況下甚至有機會晉升高官。移動後的環境與新職也讓尾崎家從舊中間層、都市中的「洋服細民」，轉變為領官廳薪水、過著穩定生活、不折不扣的新中間層。不同於日本本土因工業化、商業化及都市化等內在因素所形成的「新中間層」，隨著領有殖民地臺灣，因應統治機構整備、擴張所需的大量吏員，是殖民

⁹³ 尾崎孝子，《流水記》，頁 63；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69。

⁹⁴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⁹⁵ 尾崎孝子，〈引揚げて来た人々〉（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歌稿，年代不明）；〈引揚者一家〉，收於尾崎孝子，《女心秘抄》，頁 45-48。《女心秘抄》所收錄的短歌為 1950-1952 年間所作。

⁹⁶ 顏杳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頁 268-269。

地在臺日人「新中間層」形成的重要途徑之一，尾崎及兩個高橋家的例子正呈顯了此一樣貌。

（三）生活圈的建立與展開：殖民地「俸給生活者」的居住與關心

丈夫渡臺後不久，尾崎夫婦自舅舅家獨立，在外租屋，但也開始了因各種因素而屢次搬遷的生活。離開舅舅家之後首先搬到若竹町，1921年9月移居佐久間町，在此約居住三年多（約為1921年秋-1924年冬）。⁹⁷ 之後，因為家人、寵物增加，搬遷至龍口町四丁目，居住近兩年（約為1924年冬-1926年秋）；⁹⁸ 因屋主將房屋賣售，尾崎一家再次搬遷至龍口町一丁目（1926年秋-？）。1926年年中，丈夫患肺結核，⁹⁹ 之後為了節省開銷，再次搬到租金較便宜的住所，位於龍口町二丁目（?-1927年6月）。¹⁰⁰

從尾崎家搬遷的軌跡可以看到，皆居於城外，且為「內地人」比例較高的街區。依據1925年的《國勢調查結果表》可知，尾崎家居住的這三個町，「內地人」居住者的比例分別為：若竹町65.37%、佐久間町98.31%、龍口町85.97%，可以說是日本人的居住圈，只有第一年的若竹町與臺灣人居住比例較高的新富町（內地人比例僅26.02%）接壤，但南北的老松町與新起町仍是日人比例極高之區（老松81.44%、新起56.78%）。¹⁰¹ 也因此，儘管孝子在其短歌或著作中偶有提及臺灣人街區的風景，卻少見與臺人社會的互動。¹⁰²

⁹⁷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52、54、59。

⁹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95-96。

⁹⁹ 尾崎孝子，〈傷心抄〉，《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6月19日，第6版；尾崎孝子，〈生活苦〉，《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30日，第6版。兩者皆為自選自評的短歌，提及被醫師告知丈夫病況的心境，以及丈夫因病必須辭職的處境。此外，1927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已無尾崎保正的記載。

¹⁰⁰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98、109。

¹⁰¹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9），頁66-68，「表1-22 1925年台北市町別居住人口」。

¹⁰² 例如，曾描寫龍口町二丁目家附近的風景，有菜園、荒地、臺灣人的墓地；偶有幾隻黑豬在路旁玩耍；路中央成群的家鴨踉蹌疾走；拿著碗筷的臺人兒童坐在家門口一邊吃飯，一邊看著路過往來的人；髮上插着紅花髮簪、纏著足碎步走路的臺人老婆婆，對著散步歸來的尾崎微笑等情景。參見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111。1925年的短歌中也曾歌詠走在秋日古老房舍並排的「支那街」，或冬雨傍晚臺人叫賣火鉢灰的聲音。參見〈晚秋〉，收於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127-129。

此外，若以 1936 年的調查來看，「俸給生活者」在臺北市的居住分布，戶數最高的區塊依次為：古亭町（253 戶）、川端町（251 戶）、大正町（229 戶），龍口町（128 戶）則居第四位。儘管在時間上有些落差，但藉由這些資料相互對照可以發現，從若竹町（38 戶）到佐久間町（72 戶）、再到龍口町（128 戶）的遷移軌跡，恐怕也顯示了尾崎家在生活圈的選擇上日益傾向新中間層的居住環境與品味。¹⁰³

由於丈夫除了任職總督府外，還在中學夜校兼職教英語，一週八小時，經濟狀況穩定，1922 年 3 月孝子便辭去植物園的工作，開始專注於自己「想做的事」。¹⁰⁴除了閱讀、立志成為作家外，她也與殖民地的日本人社群保持一定的往來。

1921-1922 年孝子參加基督教信仰的私人集會「杜の集まり」，成員僅六人，都是在植物園工作者。成員之一師事內村鑑三，屬無教會派，傾心自由宗教。¹⁰⁵1923 年 6 月妹妹一家渡臺，同年 11 月孝子加入短歌結社，閒暇之時，便與舅舅、妹妹一家同遊，或與短歌結社同人登山、聚會。¹⁰⁶顯示在臺的交友、生活圈，以植物園的工作、家人以及短歌結社串起的人際網絡為主。

另一方面，儘管尾崎夫婦和金平亮三一家有私交，偶爾也至金平家中作客，但金平夫人參加矯風會等活動，卻未見孝子積極投入。¹⁰⁷從孝子參與的社群及生活圈可以發現，其活動場域傾向於「私人」的、較「自由」的、或「非官方」的性質。

相對於官製團體的參與，孝子自己創辦了「臺北主婦之會」——與統治當局的政策無涉，也與當時官夫人組成的各式「婦人會」無關，而是基於「新中間層」對家計的考量和構想。該會緣起於渡臺兩年多後，保正心血來潮買來的一臺縫紉機。孝子接觸起縫紉，做出興趣與心得後，開始受鄰居委託縫製制服、家居服等，不久後的 1923 年 3 月，索性成立了「臺北主婦之會」，讓有興趣者彼此交換縫紉技術、材料、編織物等，也提供多餘物品的委託販賣，讓家庭主婦可以比市價更便宜的價

¹⁰³ 〈台北市ニ於ケル俸給生活者分布圖〉，收於臺北市社會課、臺北市社會事業助成會編，《臺北市に於ける中間層俸給生活者住宅調査》。

¹⁰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55、61。

¹⁰⁵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62-66。聚會的地點在植物園裡的員工宿舍，內容為研讀聖書、練習讚美歌。尾崎更在 1923 年 4 月受洗為基督徒。1926 年她在《あらたま》中的一篇散文亦回憶此聚會，名為「杜の家の集まり」，並寫道聚會持續約半年左右的時間，後因主辦者一家返回日本而中斷。參見尾崎孝子，〈回想の春〉，頁 7-8。

¹⁰⁶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323、328。

¹⁰⁷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49-50。

格獲得各種編織、手藝品或小孩制服。《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曾報導這項活動：「臺北佐久間町二丁目四番地尾崎孝子獲得各方面婦人們的贊同，舉辦臺北主婦之會」。根據孝子的自述，這項活動持續了三、四年，共 11 回。¹⁰⁸

不過，設立「婦人之會」，販賣手藝品、交換生活物的構想，孝子並非首創先例者。1918-1919 年左右，為克服物價高騰的生活苦境，日本本土以居住在都市中間層為對象的女性雜誌，開始獎勵家庭副業，提供各種節約、廢物利用的方法，並舉辦各式展覽會、講習會。¹⁰⁹ 例如，《婦人之友》，即曾多次舉辦「手藝展覽會」，販賣社員製作的衣服、洋菓子，並拍賣舊衣物、多餘物品等。¹¹⁰ 事實上，同一時期，國家也推行節約、家庭副業的獎勵政策，指導日常生活細節的改善，以實現合理的、文明化的、科學的近代生活。小山靜子的研究指出，這是國家意圖創造「家庭的文明化」之一環，以此作為國家的基礎，家庭成為政治的課題。¹¹¹

孝子離鄉前往東京後曾擔任過女性雜誌的推銷員，婚後仍是婦女雜誌的讀者，也曾運用《婦人之友》設計、發行的家計簿記錄家中收支，¹¹² 加上 1918-1919 年左右仍生活在物價高漲的東京，推測應知曉，或接觸過這類型的拍賣、展示會。因此，設立「臺北婦人之會」、販賣手藝品的構想，很可能是受到日本都市生活經驗或婦女雜誌的影響。只是，從孝子的角度觀之，她並未意識到合理的生活與國家之間的關聯性，倒是對於家計的考量和婦人雜誌一致。

此外，孝子認為主婦之會存在的意義在於，透過這些交換、買賣，可以獲得正當的工資分配，思考勞動的意義、金錢的可貴，¹¹³ 這一點亦和《婦人之友》創辦者羽仁もと子¹¹⁴ 的論述十分相似。羽仁在 1919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鼓吹各

¹⁰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71-75；〈臺北主婦の會 二十二日南門公會堂で〉，《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1 日，第 7 版。

¹⁰⁹ 小山靜子，《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頁 67-76。

¹¹⁰ 〈手藝展覽會の御報告〉，《婦人之友》12: 6 (1918 年 6 月)，頁 140；〈手藝展覽會即賣會〉，《婦人之友》12: 10 (1918 年 10 月)，頁 14-15；〈手藝展覽會即賣會の報告〉，《婦人之友》12: 11 (1918 年 11 月)，頁 134-135。

¹¹¹ 小山靜子，《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頁 77-105。

¹¹²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6、8。

¹¹³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72-75。

¹¹⁴ 羽仁もと子 (1873-1957)，生於青森縣八戸，出身南部藩士松岡家。1889 年遊學東京，入東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畢業後，入明治女學校高等科。17 歲受洗成為基督徒，參加植村正久的教會，屬無教會派。1892 年明治女學校中輟，回故鄉擔任教師，歷經結婚、離婚後，再度上京，擔任報知社新聞記者。在職場結識羽仁吉一，婚後兩人離開報知社，1903 年共同創辦雜誌《家庭之友》，1908

地設立「主婦之會」，她認為物價飛漲意味著勞力和物資可貴、金錢價低，然而眾人卻習於惜金，因此提案藉由設立「主婦之會」，提供、交換才能、勞力及物資。通篇基於思考勞力、物資和金錢之間的關係，並提出各種具體實行的方式——不透過商人、公司，進行裁縫、家務雜事、養雞種菜、烘培、物產交換等。¹¹⁵ 由此觀之，孝子無論在作法或思想上都很可能受到此一論述的影響。

不過，設立「臺北主婦之會」，背後其實還有不同於上述、屬於殖民地獨特的情境及更複雜的想法。1928年孝子在《美麗的背景》中直白地陳述對大官夫人狐假虎威的樣貌感到輕蔑，對與自己同為「中產階級」的婦人之無為無聊感到焦慮：

雖然不是全部，但這些人，對於政局形勢如何，現在的潮流往何處流，思想如何推移，藝術開出甚麼樣的花，科學進步到何種程度，一概不關心。只在乎衣服的流行、髮型的變遷、化妝品的好壞、與生活直接相關的物價高低。

即便難得有對手藝感興趣、擅於和洋裁縫的人，也僅只是圖家庭內的便利，很少活用延伸至真實的社會。偶有令人感佩、從事家庭副業的婦人，但那人忙於副業，對於早晚的報紙、新刊的雜誌連看也不看。¹¹⁶

因此，孝子原本的構想是透過這樣的團體交換雜誌、推廣閱讀，然而這部分卻未實現，顯示在中產婦人之間更關心的是家計。事實上，孝子日後因丈夫罹患結核，返日前曾舉辦展覽，拍賣親手製作的皺紋紙花卉、娃娃，以籌措旅費。¹¹⁷ 手藝拍賣會的構想顯然來自臺北主婦之會。顯示集會、展覽拍賣會作為貼補家計的功能更大於推廣閱讀或智識交流。

綜觀上述「臺北婦人之會」設立的脈絡和目的，可知孝子並非對時局、外在世界不關心，只是這些思考並非從國家出發，而是從身為一位有品格的中產階級

年改題《婦人之友》。為日本第一位女記者，提倡家庭生活的合理化。參見齊藤道子，〈羽仁もと子の思想：家事家計論を中心に〉，收於近代女性史研究会編，《私たちの近代》（東京：柏書房，1978），頁144-170；齊藤道子，《羽仁もと子：生涯と思想》（東京：ドメス出版，1988）。

¹¹⁵ 羽仁もと子，〈自他の才能の提供と利用：全國到るところに『主婦の会』の設立を提議す〉，《婦人之友》13:1（1919年1月），頁2-10。

¹¹⁶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72-73。

¹¹⁷ 〈花とお人形の會 短冊展も同時に 本社三階で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12日，夕刊第2版。

女性之角度思考。若與同為新中間層，但積極參與官夫人組成的婦人修養會，並活躍其中的高橋鏡子相較，¹¹⁸ 孝子雖然也關心婦女議題，卻不積極加入官製團體，而是自創與家庭主婦相關的結社。從信仰態度、不積極參加官夫人們的活動，或許也可窺見其自由主義的傾向，顯現了另一類中間層女性的態度。

（四）以臺灣為起點的職業寫作生涯

商家出身、未入女學校、不具學歷等文化資本的孝子，未能與舊士族家出身，受高等女子教育的高橋鏡子一樣，在殖民地擔任女教師，或擁有穩定、體面、需要特定技能的職業。擁有能養活自己的日薪收入、近似職業婦女的狀態僅有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丈夫渡臺不久後，便離開了職場，其大部分時間耗費在家庭生活、與家計相關的活動，以及自我充實、創作練習。1922-1926 年這段期間，在日常生活、家計經營打理的面向上，孝子可說過著和一般新中間層家庭主婦相似的生活。然而，不同於一般家庭主婦的是，她持續抱持少女時代以來的文學夢，並開始積極創作。這段時間，也是她邁向歌人、職業寫作生涯的時期。

渡臺之初，孝子雖然一心想走文學之路，也努力閱讀、充實自我，但並未確立自己的方向，如上所見，也常分心做一些其他的事，直到 1923 年後，才專注於短歌一途。

事實上，孝子渡臺的 1920 年，臺灣短歌歌壇尚未成熟。臺灣的短歌文學發展較俳句慢，1905 年左右雖然出現了短歌雜誌，但並不興盛，直到 1922 年 12 月，濱口正雄（號梢雲）、樋吉正治（八重潮路）、國枝龍一（邦枝龍）等成立了短歌結社「璞玉（あらたま）短歌會」，發行歌誌《璞玉（あらたま）》，並定期在樋吉的寓所舉行歌會，情況才出現轉變，臺灣短歌歌壇亦在此時逐漸形成。¹¹⁹

1923 年 8 月，平井二郎渡臺，在《臺日》發表〈讀年刊歌集（年刊歌集を讀む）〉（同年 9 月 27 日-10 月 13 日，連載十二回），給予臺灣短歌運動極大的刺激，

¹¹⁸ 顏杏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頁 270-275。

¹¹⁹ 樋吉是新公園旁內科、小兒科的開業醫。參見〈卷末記〉，收於平井二郎，《攻玉集》（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1927），頁 1；河原功，〈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解説〉，頁 370-371；周華斌，〈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臺灣的短歌與俳句文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38-39。

也引起了短歌熱潮，平井亦於同年 10 月加入「璞玉」。¹²⁰ 隔年 2 月，濱口因個人因素原想中止發行《璞玉》，平井繼而接下編輯發行工作，並透過擔任《臺日》〈臺日歌壇〉評審的機緣，邀集許多歌人加入「璞玉」。¹²¹ 《璞玉》一直發行至 1945 年，成為日治時代發刊最久的歌誌，與俳誌《尤加利（ゆうかり）》並稱「臺灣文藝雜誌中的兩橫綱」。¹²²

孝子於 1923 年 11 月加入「璞玉」，亦是受到平井二郎的影響。她在處女歌集《合歡之花》的〈卷末記〉中寫道，臺灣文壇幼嫩難以滿足其藝術的慾望，正感到寂寥落寞之時，1923 年秋，在《臺日》讀到該年的〈讀年刊歌集〉，連日刊載的評論周到、認真，讓她驚異於臺灣有人這麼懂歌，心想定要一會，而此人正是平井二郎。自此，原本方向不定的孝子開始將目標投注於短歌的創作。¹²³

加入「璞玉」後，孝子開始專心從事短歌的創作，從 1924 年年初開始，頻繁地在《臺日》發表短歌，與吉植庄亮¹²⁴ 在短歌上的學習、交流亦始於同年夏天。¹²⁵ 1926 年更出版第一本個人歌集《合歡之花》，並在新公園的咖啡館ライオン舉辦紀念會；該歌集收錄了 1924 年至 1926 年 8 月為止所創作的三百多首短歌。¹²⁶ 殖民地臺灣尚在起步、發展的短歌歌壇，提供了孝子發表舞臺與自我實現的場域。

《合歡之花》卷末中提到，這本歌集捨棄了 1924 年以前的創作，意味了在加入「璞玉」之前，也有零星的創作。《臺日》可以找到其最早的創作為 1922 年發表的童謠〈紅雀〉，¹²⁷ 創作靈感其實來自家人從南洋歸來時帶給她一隻紅雀作為禮物。¹²⁸ 加入「璞玉」後，將日常生活的點滴、心境寫入短歌，仍是孝子創

¹²⁰ 河原功，〈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解説〉，頁 370-371；平井二郎，〈卷末記〉，頁 1。

¹²¹ 國枝龍一，〈あらたま十年史〉，《あらたま》10: 12（1931 年 12 月），頁 24-36。

¹²²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一）〉，《臺灣時報》昭和 10 年 2 月號（1935 年 2 月），頁 134-140。

¹²³ 〈卷末記〉，收於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 4-5；國枝龍一，〈あらたま十年史〉，頁 24-36。

¹²⁴ 吉植庄亮（1884-1958），生於千葉縣。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入中央新聞擔任記者。1906 年師事金子薰園，成為歌人。1922 年創刊歌誌《橄欖》。1936 年當選眾議院議員（立憲政友會）。著有《寂光》、《煙霞集》等歌集十餘冊。參見吉植庄亮，《吉植庄亮全歌集》（東京：柏葉書院，1970）。

¹²⁵ 植吉庄亮，〈序〉，收於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 1-6。

¹²⁶ 尾崎孝子，〈卷末記〉，頁 3；國枝龍一，〈あらたま十年史〉，頁 24-36；〈「ねむの花」の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27 日，夕刊第 2 版。

¹²⁷ 尾崎孝子，〈童謠 紅雀〉，《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9 月 20 日，第 7 版。

¹²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55。

作特色。《合歡之花》中，收養女兒、被喚為母親的心情、臺北郊外（水源地、草山）踏青時的寫景、庭院中植物四季變化、丈夫患病後的心境與經濟上面臨的窘迫等，都成為她短歌的書寫內容。這些生活點滴的描寫，事實上也以散文形式表現在《美麗的背景》中。¹²⁹

這樣的寫實風格也一貫地呈現在戰後的歌集中。例如，1954年出版《歷程》，描寫擔任議員的心情、成為祖母後與孫子的互動、旅行見聞等。¹³⁰ 孝子逝世後，《歌壇新報》刊載了許多友人為其所寫的追憶文，平井二郎寫道：「這個人的一生一路走來，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この人はしたい放題のことをし言いたい放題のことを言つて来たと思ふ）」，或許道盡了孝子的個性。¹³¹ 這樣的直率風格也反映在她的創作上，即便小說創作，亦是以寫實手法書寫自身經驗。

除了日常生活描寫外，對臺灣的自然觀察，感受四季變化，描寫細微處的感動，是孝子短歌被視為眼光獨到、感人之處。〈臺灣的自然與歌〉一文，即展現了她對臺灣四季觀察的細膩與獨到之處。這篇文章的寫作動機在於向日本內地歌人說明兩地的風土氣候差異。¹³² 孝子從1924-1928年的《璞玉》中，挑選了「能如實表現臺灣色彩」的短歌，並分成春、夏、秋、冬、雜五部，詮釋這些短歌所傳遞的意境，解釋臺灣四季特色及其與日本的差異。¹³³ 殖民地的生活體驗、臺灣的四季風景，可說是孝子創作的來源和材料，這一點也呼應了她的自述——要成為藝術家必先豐富自身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孝子第一次將短歌創作以及寫作當成職業，甚至是收入的重要來源，始於第一本歌集——1926年在臺灣出版的《合歡之花》，時為丈夫保正患肺結核離職，經濟陷入困境之際。她曾在《美麗的背景》中描述保正患病離職後，失去月薪、住宿津貼，向親人借款等的生活窘境，甚至記下對丈夫上司不予

¹²⁹ 尾崎孝子，《ねむの花》；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

¹³⁰ 尾崎孝子，《歷程》。

¹³¹ 平井二郎，〈ある一日〉，《歌壇新報》（1970年6月25日），頁3。

¹³² 尾崎孝子，〈臺灣の自然と歌〉，頁255-300。1927年4月，孝子回到東京，一位歌友對她說，常被在臺歌人若無其事吟詠的短歌驚嚇，例如，「時雨（秋末初冬の霏霏細雨）沾溼桃花」、「寒雨日日落下，若草顏色漸深」、「春天蟋蟀鳴叫」等，孝子才恍然大悟於對方的吃驚。從孝子面對歌友的反應，也可窺見其對迥異於日本的臺灣四季變化已習以為常。

¹³³ 孝子選歌之中譯，可參見陳黎、上田哲二所譯，《臺灣四季：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除了〈東臺灣之歌外〉，皆出自孝子〈臺灣的自然與歌〉，「譯注」亦多譯自其選歌時的解釋與評論。關於孝子的短歌創作風格、書寫中的臺灣風景等，關係著短歌在臺灣的發展，由於題旨與篇幅的限制，在此暫不討論。

通融的怨恨。¹³⁴ 《合歡之花》亦描寫對沒有收入的未來之擔憂，以及靠著看病之餘踩踏縫紉機，賺取比家庭代工更微薄的收入。¹³⁵ 《合歡之花》出版後，全數賣盡，獲得百餘圓收入，給予孝子極大的鼓勵與信心。因此，寫作《美麗的背景》時，孝子將讀者設定為一般人——不同於只限少數人閱讀的歌集，而是以臺灣生活為主題、任誰都會感興趣的創作，這樣的設定，除了希望探究人生，以文筆立於世之外，還有經濟上的考量——期待有良好的銷量，以助丈夫病後拮据的處境。¹³⁶

離臺後的 1928 年春天，孝子前往東京擔任《鐵道青年》雜誌的婦人記者。一年多後，辭去記者之職的孝子，有一段時間沒有穩定收入，1929 年出版第二本歌集《南天燭》，亦被她視為生活資助。¹³⁷ 之後，孝子到楠田敏郎的《短歌月刊》幫忙，1931 年 8 月，性質接近該刊附錄的《歌壇新報》創刊，楠田邀請孝子擔任營業部主任；《歌壇新報》創刊成員之一的美木行雄辭去記者之職後，孝子更接任記者工作，並統籌編輯、發行等報務，成為該報的重要記者與成員。¹³⁸ 孝子自此以記者和歌人的雙重身分活躍於神奈川歌壇，這也成為她終其一生的職業。

綜觀這些歷程，可以發現，自從在臺灣出版第一本歌集《合歡之花》，直至返回日本，孝子皆從事與寫作相關的工作，並視短歌、創作為重要經濟來源，也確實成為女性職業歌人、記者。可以說，孝子踏入短歌歌壇，至人生的終點也都從事與短歌、寫作相關職業，而這樣的職涯，是以臺灣為起點。

五、與臺灣之間的牽繫：從他鄉到故鄉

1926 年，孝子的丈夫罹患肺結核，隔年 2 月，孝子從「璞玉」退社，同年夏天，陪同丈夫返回日本至療養院休養。返日後的尾崎夫婦，仰賴在神戶魚崎的母親、兄長生活，半年後保正逝世（1927 年 12 月 10 日）。¹³⁹ 丈夫逝世兩個月後，

¹³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08-147

¹³⁵ 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 174-176。

¹³⁶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221-222。

¹³⁷ 〈おわりに〉，收於尾崎孝子，《南天燭》，頁 156。

¹³⁸ 尾崎孝子，《萬華鏡》，頁 162-172；尾崎孝子，〈行雲記（二）～（五）〉，《歌壇新報》（1970 年 6 月 25 日），頁 12。

¹³⁹ 〈尾崎孝子送別歌談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6 月 26 日，夕刊第 2 版；國枝龍一，〈あら

孝子再度來到臺灣（1928年2-5月），將丈夫遺骨葬於三板橋的日本人墓地。描寫臺灣生活、最終也在臺灣完稿、出版的《美麗的背景》卷首，寫著「獻給亡夫之靈」，卷末則寫道：

最後為了遵循亡夫生前的意志，以及我自身將來的希望，抱著在內地療養地往生的丈夫遺骨，再次渡臺的我，立起了丈夫小小的石碑，在臺北北郊三板橋的墓地上，我希望這埋葬的機緣是欣慰的。我由於生活不得已必須定居內地，今後一定會有機會渡臺，祭拜丈夫之墓。從今而後，我想稱呼臺北為故鄉。

懷念的故鄉、美麗之島臺灣，請永遠幸福。（旁點為孝子）

昭和三年四月末日 於南門町暫居處¹⁴⁰

三板橋是日人的公共墓地，乃木希典之母長谷川壽子、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皆葬於此，並賦予「人柱」¹⁴¹的象徵意義；在日人眼中，三板橋留駐了許多「犧牲者」、「功勞者」的英靈，是臺灣「建設時代的殿堂、巨塔」。¹⁴²孝子的丈夫在總督府覓得一職，因此埋骨臺灣的意志或許也受到官方言論影響。但對孝子而言，臺灣何以成為故鄉，將丈夫遺骨帶回臺灣的意義為何，恐怕無法以官方輿論道盡。若檢視其移動歷程，將會發現「故鄉」的情感並非一開始即存在，而是日常生活中諸多細節累積而成。

孝子的渡臺原是計畫旅居半年，丈夫保正亦只是打算度過不景氣，因此渡臺的前幾年兩人一直有著「腰掛」（暫時、一時之計）的心情，時常懷念東京，也曾考慮若景氣轉好，要回到東京生活。然而，1923年5月，尾崎夫婦獲得休假回

たま十年史》，頁24-36；〈哀傷賦〉，收於尾崎孝子，《南天燭》，頁66-84；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145。

¹⁴⁰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346。另參見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臺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頁173-217。

¹⁴¹ 在日本的地方傳說中，指進行大規模建築、堤防等困難的工程時，將活人獻給神，以獲得神靈的護持。在尾崎秀真的書寫中，用來比喻為了統治臺灣而犧牲的人。

¹⁴² 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三十一）三板橋（上）〉，《臺灣時報》昭和12年12月號（1937年12月），頁136-140；尾崎秀真，〈臺灣四十年史話（三十一）三板橋（下）〉，《臺灣時報》昭和13年2月號（1938年2月），頁95-99。

內地掃墓，上京使他們意識到的現實是，令人感到厭煩、辛苦的都會生活，以及親戚間難以處理的紛爭。停留一個月回到臺灣後，如釋重負，對於在此地擁有自己的家感到可貴。約當此時，尾崎夫婦開始萌生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念頭。¹⁴³

1923年省親歸鄉返臺時，妹妹一家也隨之渡臺，豐富了尾崎一家在人際網絡上的相互支撐與往來，之後的日常生活中，陸續領養小孩、寵物，在庭園中種植花草樹木，這些也都是孝子情感的寄託。1924年年末，從居住三年、有庭院的佐久間町搬遷至龍口町時，孝子發現植物移植困難；之後新居庭園中依然種植各類植物，但每當搬家時就必須移植或捨棄一直以來細心照顧的植栽，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細微存在，也讓她心生想擁有自己的土地，在臺灣紮根的想法。¹⁴⁴

事實上，《合歡之花》所收錄的短歌中，較早期的作品（1924年）還有「憶故鄉」之主題，懷念冬日家鄉的山景、夜晚落雪、朝日積雪，以及春雨中沾溼的櫻花等；¹⁴⁵ 所憶之故鄉應是山城福島，而非大都會東京。此外，亦寫身處異鄉，思念內地的母親之心情，¹⁴⁶ 然而1925年後已不見這類懷念「內地」家鄉、親人的作品。反而在戰後所寫的短歌中，可以看到離臺多年的她仍抱持著對臺灣的懷念：「二十來歲的野心勇敢馳騁 我生活過的臺灣 在美麗的自然中」。¹⁴⁷

對孝子個人來說，正值青春盛年之時渡航臺灣，追求自身夢想與自我實現；殖民地是可以擺脫傳統束縛與框架的自在之處；在此地與丈夫展開新生活、有自己的人際網絡、親人、工作、小孩、寵物、細心照顧的植物；出版第一本歌集，踏上夢想中的文學之路，臺灣對她而言具有多重意義。臺灣也是她與丈夫婚姻生活中度過大部分時間之地，對尾崎夫婦而言，臺灣不但是展開新生活之地，也是尋找希望與夢想、夢想逐漸成真之地。這些恐怕都是孝子將保正遺骨埋在三板橋的原因，而當臺灣確確實實成為丈夫的長眠之所時，臺灣更是立基於複雜情感上、多重意義的故鄉。

但不能忽視的是，這些日常生活中所累積、隱含多重情感的故鄉意識，是在帝國——殖民地間移動、生活的差異經驗，以及殖民地的權力結構中產生。在官

¹⁴³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98。

¹⁴⁴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98。

¹⁴⁵ 〈故郷を憶ふ〉，收於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1-4。

¹⁴⁶ 〈ははそはの母〉，收於尾崎孝子，《ねむの花》，頁34-38。

¹⁴⁷ 〈夢二題〉，收於尾崎孝子，《女心秘抄》，頁153。

廳任職的保正，除了月薪之外，尚有住宿津貼，¹⁴⁸ 渡航殖民地使尾崎家得以脫離日本都市中「洋服細民」的行列；擁有較日本本土優渥的薪資所得與生活條件，也使孝子有餘裕實踐自己的夢想，展開令她日後懷念的生活。另一方面，孝子雖然不是戰後的遣返者，但偕夫返日療養後與母親、兄長同住，一直都有寄人籬下、與遣返者相似的心情——長年自由的殖民地生活讓她回到日本後不習慣，食物的喜好也完全不同，而母親在有意無意中也以食客待之。¹⁴⁹ 此外，上京期間向親友借款受到冷遇，最後伸出援手的是居臺者，為歌集、創作出版盡力者亦是在臺友人，這些都使她對臺灣感到親近遠勝於日本。¹⁵⁰ 居臺期間短暫返鄉時的拘束感、丈夫內地療養期間飽受人情冷暖、丈夫逝世後歸返日本的移動，以及移動之後的諸多感受與遭遇，恐怕也是孝子視臺灣為故鄉的原因。

離臺後，孝子與臺灣仍保持關係，除了 1928 年丈夫逝世後來臺三個月，在草山上完成《美麗的背景》一書的後半，¹⁵¹ 5 月，新書上梓，在榮町「水月」舉辦新書發表會。¹⁵² 停留臺灣期間，也將離臺後的經歷、處境寫成短歌投稿於《臺日》；¹⁵³ 直至 1929 年、1930 年都可以在該報見到其投稿的短歌。

在她擔任記者、總編的《歌壇新報》，版面上時常可見臺灣歌壇的動態與《璞玉》歌誌廣告，顯示返日後依然與臺灣歌壇保持著一定的聯繫。1935 年 2 月，孝子展開了一個月的長途旅行，途經京都、大阪、門司，也再度訪臺，與臺灣歌人交流，當時數個短歌結社團體（璞玉、相思樹、朱轎、國民文學臺北支部）在教育會館為她舉辦歡迎歌會，並於江山樓晚宴。¹⁵⁴ 1940 年，臺灣詩人、也曾加入璞玉社的陳奇雲逝世，孝子在歌稿中紀念他。¹⁵⁵ 顯示直至戰爭結束前，孝子與

¹⁴⁸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109。

¹⁴⁹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203-204。關於戰後遣返者的心境，參見顏杏如，〈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臺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頁 210-215。

¹⁵⁰ 尾崎孝子，《美はしき背景》，頁 215-223。

¹⁵¹ 尾崎孝子，〈卷末に〉，頁 344-345。

¹⁵² 〈尾崎孝子女史の創作 發表祝賀のつどひ〉，《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5 月 14 日，夕刊第 2 版。

¹⁵³ 尾崎孝子，〈離臺以後（一）〉、〈離臺以後（二）〉、〈暗愁（一）〉、〈暗愁（二）〉、〈灘に住みて〉、〈臨終〉、〈告別式〉、〈火葬場〉、〈二七日を経て〉等篇，刊於《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4 月 21 日-5 月 11 日。後收於《南天燭》。

¹⁵⁴ 〈尾崎孝子氏の歡迎歌會〉，《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島都臺北合同歌會 於教育會館廣間 相思樹、朱轎、國民文學支社、あらたま四社主催〉，《歌壇新報》（1935 年 3 月 27 日），頁 2；〈旅行みやげ 初対面の記〉，《歌壇新報》（1935 年 3 月 27 日），頁 3。

¹⁵⁵ 尾崎孝子，〈陳奇雲氏を〉（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歌稿，年代不明）。

臺灣的歌壇保持了一定的聯繫。

順帶一提，1920年代以來，逸脫於國家教化框架之外的孝子，在回到日本後的1930年代後半，無可避免地也捲入了戰時體制之下。戰時，無論在日本或殖民地臺灣，短歌被用以宣傳國策、作為文學報國的工具——歌頌皇國、鼓舞士氣、連結日本傳統精神與國民性。¹⁵⁶ 在這樣的局勢下，身在日本、擔任《歌壇新報》記者的孝子似乎也無法置身其外。

1935年起，《歌壇新報》幾乎每年編輯、出版《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孝子參與了這項工作，並為每本歌集寫下〈後記〉，自身的短歌也刊登其上。¹⁵⁷ 但昭和13年度（1938）第四輯的《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增附《女流銃後歌集》，以徵稿方式選歌，附錄在自選歌後半。孝子自身只有前半自選歌，未創作與戰爭、鼓舞皇國精神相關的短歌，但仍參與了編輯工作，並寫下〈後記〉；¹⁵⁸ 1942年第五輯甚至更名為《現代代表女流銃後歌集》，她自身亦有短歌創作刊登其上。〈後記〉寫道：「在空前的戰爭下能出版這樣的印刷物，切身地感到感謝，戰線後方（銃後）女性們的趣味娛樂——歌的生活，今後必須對與遙遠萬葉相連的日本傳統，以及日本精神的昂揚，有所益助，我想必須要更精進不懈」。¹⁵⁹ 這也暗示了在此之前，短歌對孝子而言是一種「趣味娛樂」，和日本精神的連結是未曾認真思考過的問題。

1939年2月中旬，孝子以皇軍慰問使的身分隻身經由臺灣前往廣東，以《明治天皇御製集》、《女流歌人銃後歌集》中的短歌慰問士兵，並且，在此行中受當時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¹⁶⁰之夫人委託，將慰問品交給當時的南支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¹⁶¹ 戰後，板垣成為遠東國際法庭的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孝子曾在

¹⁵⁶ 周華斌，〈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臺灣的短歌與俳句文學〉，頁50-61。

¹⁵⁷ 目前筆者找到的國會圖書館現藏有：歌壇新報社編，《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第一～三輯）》（東京：該社，1935-1937）；歌壇新報社編，《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第四輯）附女流銃後歌集》（東京：該社，1938）；歌壇新報社編，《現代代表女流銃後歌集》（東京：該社，1942）。

¹⁵⁸ 歌壇新報社編，《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第四輯）附女流銃後歌集》。

¹⁵⁹ 歌壇新報社編，《現代代表女流銃後歌集》。

¹⁶⁰ 板垣征四郎（1885-1948），生於岩手縣，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關東軍參謀長等職，1938年6月3日-1939年8月任陸軍大臣。關東軍高級參謀任內，與石原莞爾共同策劃九一八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遠東國際法庭定為A級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內處以絞刑。

¹⁶¹ 尾崎孝子，《萬華鏡》，頁157、125-127。

歌集中寫下既悲憐友人、想給予安慰，又痛苦、矛盾的複雜心情。¹⁶² 在戰爭時期，孝子如何面對國家權力；戰後，又如何面對殖民地與戰爭經驗，是否僅是如表面所見，抑或有著更複雜的軌跡與糾葛，因題旨與篇幅的限制，留待日後作為尚待考察的課題。

六、結論

本文嘗試追探一位擁有殖民地經驗的女性歌人尾崎孝子的軌跡——移動、創作與時代、社會、個人生命經驗的交錯歷程。從新女性的思潮、中間層的位置、在殖民地的舉措觀之，其案例揭示了迥異於過去我們所熟悉的歷史圖像，另一種日本女性航向臺灣的殖民地經驗與意義。

與過去所見的類型不同，孝子向殖民地的移動並非迫於生計，也非在日本發展不順遂而向外移動，相反地，在逐漸穩定的生活中，孝子開始追求自我與夢想。這樣的個人生命實踐，萌芽在 1910 年代新女性思潮的大環境下；在其敘述中，也見到此類追求自我而移動的女性們之身影。

孝子的移動也與另一類受國家思想灌輸，認為女性應向外開拓、在帝國擴張中扮演輔佐男子角色的移動類型相對照。國家並不在孝子向外移動的視野中，自我追求、充實與實踐，才是移動、離鄉的目的所在。因此，在她留下的紀錄中，看不到向外開拓、賢妻良母的概念；嚮往文學之路，反而是在當時流通的大眾媒體——少女雜誌、文學作品——中形成的意識，對文學的憧憬也進而將孝子推向殖民地臺灣。

在孝子的移動軌跡中，從地方到都市、從都市到殖民地，過程中也顯現了社會階層的跨越與移動。原屬地方小鎮的舊中間層，在日俄戰後經濟變動中沒落，及至一次世界大戰後向都市移動謀生，淪為中下階層、勞動者，活在雜沓紛擾的都市社會，在社會底層與中層之間游移；然而，向帝國邊陲的殖民地移動，卻使之覓得安穩的棲身之所，晉身為新中流階級。殖民地官僚制度的縫隙，讓不同類型的日本人在移動後成為受僱於官廳的受薪階級，顯示了殖民地新中間層形成的

¹⁶² 〈つまになれば 板垣喜久子夫人に〉，收於尾崎孝子，《女心秘抄》，頁 32-35。

一個面向。

另一方面，帝國的擴張、既存的人際網絡，則提供了向外移動的路徑。相信移動／離鄉可以帶來改變的女性們，移動的範圍已不只從鄉村到都市，更從都市越境至殖民地。殖民地成為資源提供者，包含物質和精神的層面。物質上，下級官吏以下非正式的僱用制度、縫隙，提供了移動者及其家族穩定，甚至是優渥的生活基盤；精神上，臺灣的生活、體驗，以及迥異於日本的風土，提供了創作的養分與素材。殖民地也是逃脫各種束縛的場域，在一個逸脫傳統秩序的社會中，得以更自在地開拓前人未曾走過的路；孝子踏入短歌歌壇成為職業歌人、返日後擔任歌壇記者，這番寫作的職涯之路即是以臺灣為起點。

在殖民地的生活，擁有家人親族、職場、歌壇、婦人團體等多重生活圈、人際網絡與社群。不過無論是居住區或生活圈，仍限於在臺日人社會，而未與臺灣人的生活圈有太多交集，僅在文藝圈內與極少數的臺灣人有往來互動關係。但另一方面，孝子未接受太多官方意識，雖與官方的個人有私交，但並未積極參加官製團體，而是走自己喜愛的路、成立自己想成立的團體。對她而言，殖民地臺灣是從夢想走向實踐之地，同時，也是新生活展開之地、他鄉變故鄉之地。若將孝子移動背後的動能、在殖民地生活的種種舉措，和深受國家思想影響、抱持女性應輔佐男性向外開拓、強調女子教育之重要性的另一類日本女性相互對照，可以窺見 1920 年代中間層日本女性向殖民地移動，存在著更多樣、複雜的動力、路徑與圖像。

不過，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儘管抱持文學夢的孝子，與帶著帝國擴張使命向外移動的高橋鏡子，¹⁶³ 在出身背景，以至移動動機、職業、社群、生活重心、國家意識等殖民地經驗的諸多面向上存在著差異樣態，各自象徵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移動類型，然而，同屬殖民地中間層的她們，也存在著共通之處——移動過程皆透過在臺親族網絡，與臺灣人社會的互動微乎其微，殖民地皆是她們施展自我、社會階層向上移動的場域。她們的移動軌跡，也呈顯日本本土的思潮如何藉由移動，在帝國「邊境」之地發酵、實踐，甚至，透過女性的主體性產生變化。

¹⁶³ 關於高橋鏡子的狀況，詳見顏杳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頁 251-302。

引用書目

《女子文壇》

《婦人之友》

《歌壇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時報》

〈鎌倉市市會議員候補關係資料〉。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

尾崎孝子，〈引揚げて来た人々〉（歌稿，年代不明）。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

尾崎孝子，〈陳奇雲氏を〉（歌稿，年代不明）。神奈川：神奈川縣立圖書館神奈川資料室尾崎文庫藏。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下載日期：2015年6月25日，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

「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下載日期：2015年6月25日，網址：http://taif.tfri.gov.tw/taif_ch/。

「植物園臘葉館」，下載日期：2015年6月25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AA09711000003&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2&siteId=101#01>。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

1997 《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

大河内一男

1960 《日本的中産階級》。東京：文芸春秋新社。

大濱徹也

1970 《明治の墓標：「日清・日露」一埋れた庶民の記録》。東京：秀英出版。

小山静子

1999 《家庭の生成と女性の国民化》。東京：勁草書房。

上野千鶴子

1994 《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東京：岩波書店。

杉本邦子

1999 《明治の文芸雑誌：その軌跡を辿る》。東京：明治書院。

今田絵里香

2007 《「少女」の社会史》。東京：勁草書房。

天野郁夫

1992 《学歴の社会史：教育と日本の近代》。東京：新潮社。

太田登

2006 《日本近代短歌史の構築：晶子・啄木・八一・茂吉・佐美雄》。東京：八木書店。

木村真佐幸

2005 《樋口一葉と現代》。東京：翰林書房。

永嶺重敏

1997 《雑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

- 平井二郎
1927 《攻玉集》。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
- 石川晃弘
1982 《みせかけの中流階級：都市サラリーマンの幸福幻想》。東京：有斐閣。
- 吉植庄亮
1970 《吉植庄亮全歌集》。東京：柏葉書院。
- 寺出浩司
1994 《生活文化論への招待》。東京：弘文堂。
- 朱惠足
2007 〈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 49-86。
- 林玉茹
2000 〈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7(2): 51-93。
- 有吉広介、浜口晴彦（編）
1982 《日本の新中間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竹中信子
1995 《殖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1) 明治篇》。東京：田畑書店。
- 羽仁もと子
1919 〈自他の才能の提供と利用：全國到るところに『主婦の会』の設立を提議す〉，《婦人之友》13(1): 2-10。
- 佐佐木舜一
1930 《臺灣總督府林業部臘葉館目錄》。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
- 吳永華
1997 《被遺忘の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 吳佩珍
2013 《真杉靜枝與殖民地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吳明勇
2012 〈殖民地林學的舵手：金平亮三與臺灣近代林業學術的發展〉，《臺灣學研究》13: 65-91。
- 尾崎孝子
1926 《ねむの花》。東京：ポトナム社。
1926 〈回想の春〉，《あらたま》5(4): 7-8。
1928 《美はしき背景》。臺北：あらたま發行所。
1929 《南天燭》。東京：橄欖社。
1953 《女心秘抄》。神奈川：歌壇新報社。
1954 《歷程》。神奈川：歌壇新報社。
1957 《萬華鏡》。鎌倉：歌壇新報社。
1964 《草木と共に》。鎌倉：新日光社。
1968 《花のいのち》。鎌倉：新日光社。
1970 《流水記》。鎌倉：新日光社。

李文茹

- 2004 〈帝國女性と植民地支配：1930-1945 年における日本人女性作家の台湾表象〉。愛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間情報学研究科博士論文。

村上信彦

- 1983 《大正期の職業婦人》。東京：ドメス出版。

周華斌

- 2007 〈從敷島到華麗島的受容與變異：探討日據時期從日本到臺灣的短歌與俳句文學〉。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論文。

岡本かの子（著）、宮内淳子（編）

- 1997 《岡本かの子》。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岸本重陳

- 1978 《「中流」の幻想》。東京：講談社。

斉藤道子

- 1978 〈羽仁もと子の思想：家事家計論を中心に〉，收於近代女性史研究会編，《女たちの近代》頁144-170。東京：柏書房。

- 1988 《羽仁もと子：生涯と思想》。東京：ドメス出版。

河原功（編）

- 2003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15：台湾隨筆集（一）》。東京：綠陰書房。

金子幸代

- 2012 〈「青鞜」と「女子文壇」：「新しい女」・発禁問題〉，《社会文学》35: 74-84。

金子幸代、中村真也

- 2008 〈「新しい女」とは何か：一九一三年における「女子文壇」の文化史的研究〉，《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48: 164-140。

洪郁如

- 1997 〈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 1904-1930 年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灣風物》47(2): 53-71。

- 2014 〈性別視角下的日本帝國國內移動與跨境：以臺灣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3 樓第一會議室，10 月 3 日。

島田謹二

- 1995 《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

神奈川県立文化資料館（編）

- 1976 《文化資料館資料目録：図書の一部 第 1 集「尾崎文庫目録」①》。神奈川：神奈川県立文化資料館。

- 1980 《文化資料館資料目録：図書の一部 第 2 集「尾崎文庫目録」②》。神奈川：神奈川県立文化資料館。

張素玢

- 2001 《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史館。

國枝龍一

- 1931 〈あらたま十年史〉，《あらたま》10(12): 24-36。

堀場清子

1988 《青鞜の時代：平塚らいてうと新しい女たち》。東京：岩波書店。

陳 黎、上田哲二（譯）

2008 《臺灣四季：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岡清美

1988 〈都市下層と新中間層〉，《週刊朝日百科：日本の歴史》112: 60-64。

渡部周子

2007 《〈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東京：新泉社。

奥田暁子（編）

1995 《女と男の時空》。東京：藤原書店。

歌壇新報社（編）

1935-1937 《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第一～三輯）》。東京：歌壇新報社。

1938 《現代代表女流年刊歌集（第四輯）附女流統後歌集》。東京：歌壇新報社。

1942 《現代代表女流統後歌集》。東京：歌壇新報社。

稻垣恭子

2007 《女学校と女学生：教養、たしなみ、モダン文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臺北市社會課、臺北市社會事業助成會（編）

1936 《臺北市に於ける中間層俸給生活者住宅調査》。臺北：臺北市社會課、臺北市社會事業助成會。

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査部（編）

1923 《第一回臺灣國勢調査集計原表（全島之部）》。臺北：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査部。

臺灣總督府（編）

192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8月版。

1920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2月版。

1934 《國勢調査結果表（全島編）》。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官房企劃部（編）

1940 《家計調査報告：自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三年十月》。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企劃部。

龍瑛宗

1954 〈日人文學在臺灣〉，《臺北文物》3(3): 18-22。

鍾淑敏

1986 〈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8: 74-84。

顏杏如

2008 〈流轉的故鄉之影：殖民地經驗下在臺日人的故鄉意識、建構與轉折〉，收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頁173-217。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9 〈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2013 〈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の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52: 251-302。

蘆花会（編）

1936 《徳富蘆花：検討と追想》。東京：岩波書店。

Migration and Colonial Experience of Ozaki Kouko: A “Middle Class” in Pursuit of Dreams within the New Woman Thought Movement

Hsin-ju Yen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and trace the footsteps of Ozaki Kouko, a Japanese female poet with colonial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der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paths, motivations, imag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igration of middle-class Japanese women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until the 1920s are examined.

Born in 1897 to a merchant family of the old middle class in Fukushima, Kouko witnessed the decline of her family business follow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leading to the diaspora and migration of the family. A relative that left for Taiwan would become a pioneer for Kouko, who later migrated to Taiwan herself. During World War I, Kouko became one of the numerous youth who,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merg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left the countryside for Tokyo to seek their livelihood. Kouko herself became a working woman. Owing to her merchant family background, she lacked cultural capital and hence sank into the mid to lower working class in the developing capitalist metropolis. After getting married, her social class changed once again as she became the new middle class. From the rural to the metropolitan; from a working career to marriage life, Kouko already had rich experience in geographical mi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long before her departure for Taiwan.

After marriage, Kouko's life became more stable. Despite opposition from her family, she headed for Taiwan for self-actualization and in pursuit of her dream in becoming a writer. Kouko's existing family networks, her teenage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1910s, the New Women Thought Movement, and boom in literature after the expansion of female education were driving forces behind her migration to colonial Taiwan.

In colonial Taiwan, Kouko focused on composing tankas, founded a female social group, with livelihood in mind, independent of any other official women's groups, and formed a circle of middle-class women. Colonial life, experiences and nature nurtured the creative talent of Kouko and enriched her writing. Taiwan was where her dreams were fulfilled, a foreign land that became her home and the launch pad of her writing career. Her male relatives who went over to Taiwan all obtained informal employment withi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ystem, reveal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onial new middle class.

Kouko, as a case in point, illustrated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of middle-class women: migration supported by social connections and rare interaction with Taiwanese society. Colonial Taiwan served only as a platform for self-enrichment and upward movement on the social ladder. In contrast to women that assisted men in opening up new territories under imperial expansion; Kouko's migration was not only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wise wife and good mother", but also independent of the "nation". Kouko's case was a woman figure influenced by the New Women Thought Movement opted to migrate and leave home in pursuit of self-actualization and personal aspirations.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Era, Migration, Middle Class, Ozaki Kouko, New Women, Japanese in Taiwan